



《记忆》八十八期

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三）

目录：

【特稿】

[燕纯义口述 贾明整理 待到冰消雪融时——北京四中文革落实政策记事](#)

【事件】

[张兴生 北京四中“会议记录疑案”始末](#)
[——“北京市中学干部问题联络站”的前前后后](#)

【访谈】

[赵之洪 “中统特务”三十年——朱鉴珉访谈录](#)

【述往】

[战嘉怡 北京四中的三度春秋——记忆中的 71 届 3 连 4 排](#)
[侯梦会 往事四十年——北京四中 71 届 3 连 4 排](#)

【评论】

[贾明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关于北京四中文革的种种说法](#)

【资料】

[中学新生通知书](#)
[北京四中三连四排班级大事记（1968--1971）](#)

北京四中文革大事记（王行国整理）

【来信】

- 1、赵建国、孙大军谈唐伟文
- 2、顾军骧谈本刊的“三个面向”
- 3、胡庄子转来“雄师”的来信
- 4、杜钧福指出向前论文的注释问题
- 5、张晓良谈王锐书及文革藏品

【特稿】

待到冰消雪融时 ——北京四中文革落实政策记事

燕纯义 口述 贾明 整理

一、 落实政策工作的重任落到我的头上

四中文革落实政策的工作是很艰巨的。

四中教工在文革中受冲击的程度广泛而“深刻”。被史无前例整得家破人亡的要落实政策，被无辜打成反革命的要落实政策，被无理定成历史反革命的要落实政策，被无由扫地出门、抄家的要落实政策，被错划右派的要落实政策，被撤离领导岗位“靠边站”的干部要落实政策，一些具有提拔干部条件，而受阶级斗争偏见压制的人，也要落实政策。……在当时 159 名教工中，竟有 64 人之多需要落实政策。

四中落实政策不仅涉及文革冤假错案，还涉及到大量反右运动中的错案，以及其他错整错判的人；不仅涉及运动中的落实政策，还涉及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仅涉及在教工中落实政策，还涉及在学生中落实政策。

落实政策就要解放思想。落实政策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就是否定过去，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其实就是“改正错误”的政治语言，官腔词汇。要把一个个定了铁案的“阶级敌人”从囚禁，甚至是多年囚禁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复原他的本真，谈何容易。

哪一个本真不是被恶意掩盖着的？只有拨开迷雾，行之有据地打破一个个“结论”的枷锁，才能把政策落到实处。否则“左派革命群众”那里就不答应。

当时四中的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是，以书记李恩浩（1973—1978 年校革委会主任、校长、1978—1982 年专职书记）为核心，委员韩家鳌（1978—1982 年校长）、副书记燕纯义、委员俞汝霖（原管教学的副校长）、康辑元（原管总务的副校长）等。这些人有的在文革整人中涉事不深，有的自身就是挨整的，李恩浩、韩家鳌则是新调进四中不久的，李恩浩以西城区教育局局长身份兼任四中党支部

书记。他们在落实政策工作上，没有既往的人事瓜葛，比较超脱。李恩浩其人，政策水平高，为人正直，对群众满腔热情。四中的这个领导班子，为在四中落实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

落实政策工作的重任落到我的头上。

我本来很不情愿承担这份重任。老李为动员我出任，与我推心置腹谈了5次话，最后连这样的话都端出来了：“将来在这上头出了任何问题，所有的事，都往我身上推。”

我不能不接了下来。任务再重也要把它完成好。我很明白，做好这件事，不仅是形势的要求，组织的托付，更是与多少人和他们的家庭今后生息相关。

我从1975年进入角色，一直持续到完成全部落实政策工作，才画上了句号。

哪一个错案，不是对人性摧残的血泪历史，当年落实政策的工作是复杂而艰巨的，今天说起落实政策的话题仍然是沉重的。

我要从一个个案说起，从中管窥一斑。

二、为错划右派改正

第一个落实政策的是萧立岩。萧立岩是历史教师，1957年被划为6类右派，文革清队中又被揪了出来。

一天，他找到我，请四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周长生老师转呈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他在信中申诉自己被错划为右派的委屈，要求给予平反。当年，他就是因为说了句“你W××{时任四中校长}代表不了党组织”，而被打成右派的。交信时，他还怯生生地附了一句：“如果不同意转交就算了吧。”几十年的压抑，心灵已被扭曲到连伸张自己正义权利的勇气都没有了。

周长生转交了信以后，萧立岩被错划右派问题，顺利得到改正。后来，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经手，把他的档案作了彻底的清理。

张育达，一个戴深度眼镜的小老头。他长年坐在总务处的办公桌前，给人的印象是整天“老不干事”，总是眯着两只眼“闲呆着”。但是，不论问他什么样的财务问题，他总能张口便答。他眼前总是摆着几个账本，账面非常清楚，你要是查个什么数据，总是一翻就是。他是有名的“会计怪才”。1957年被打成6类右

派。留在学校工作。此后他汲取教训，再不言语，成了一尊“坐佛”。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

当落实政策与他谈话的时候，没想到他竟出语惊人：“不用摘（帽子）了，戴着挺好！”“你年轻，你不懂。”在他看来，落实政策不过玩的是个文字游戏，没落实政策是“右派”，落实政策是“摘帽右派”，还不都是一样。

哀莫大于心死。

人们怎能读懂那一颗颗沥血的心。

被划为2类右派的物理教师张陞实在是冤枉。他在说的什么话里，有“草菅人命”一个词，便被上纲成他说“共产党草菅人命”。这还得了。他被打成顶级右派，取消了教师资格，取消了工资，每月发18元生活费，发到南郊农场劳动改造，返校后再放到校办工厂劳动。文革中，前期被打进劳改队，后期清队时再次被揪出来批斗。

张陞不仅能教书，还是个心灵手巧的能人，到校办工厂后，搞研制，搞创新，成为技术骨干。后来，他又钻研书法、绘画、篆刻，举办过作品展览。

多年郁积的压抑，造成他的性格变态，待人处事处处谨小慎微，时时在自我闭锁中过活。

直到落实政策，才结束了张陞的磨难。然而，大环境好转了，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张陞便病魔缠身，直至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一个天才被扼杀。

张陞有个有病的女儿，找工作有困难 四中帮她安排了工作。

给王钊落实政策最困难了。

物理教师王钊是教学上的一个奇才。他讲课思路清晰透彻，概念准确严密，语言简洁明了，绝无重复之句，多复杂困难的问题，一经他的讲解，都变得简易好学。经他授业的学生无不留下深刻记忆，异口同声赞誉不绝。

1957年，王钊被开列了7条“罪行”打成右派。但由于他教学上的不可或缺，继续留在学校教学，免去发到农村劳改。文革初期王钊被打进劳改队，文革后期清队再次被揪出来批斗。

落实政策时，最后剩下了王钊。给他打的平反报告，先后6次都没通过。到第7次写材料的时候，王钊找到我，心灰意懒地说“别费劲了”。天不负人，当

他接到平反通知的时候，格外激动。

从打成右派那天开始，王钊就像是失去了语言交往能力，除了在课堂上讲课以外，再也听不到王钊的声音。王钊变成了一个木头人，经常是坐在教研组里望着天花板发愣。当然，周围的人也都与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他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孤舟。

自打落实政策，人们发现，王钊不时地也有一两句话了。不曾想，因此又招来祸端。那些平日习惯了把“右派”踩在脚下的“左派革命群众”，对这一“动向”孰不可忍。物理教研组组长温炳炎，马上跑到党支部打报告：王钊“跃跃欲试”，大有右派翻天之势。

哪里还有人的活路！右派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为落实政策，我专门去了王钊家。没想到，进门一眼看到的景象把我惊呆了：两口子加上3个孩子，5口人挤在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除了两张床铺，连放一个书桌的地方都没有。他是教员，教书得备课，每天只有在孩子们都睡觉以后，再打开缝纫机当书桌，开始备课。

我的心颤抖了！

谁人知道，这就是一个中学教师——而且是优秀学校的优秀教师的生存环境？这是四中的悲哀，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我坐不住了。我径自找到市教育局侯维成局长，要房。王钊的苦难感动了上帝，仅仅一天，一处二居室的房子就交到了王钊手里。王钊，这个苦命的人，破天荒地感受到一次“党的温暖”。

王钊搬进新居的时候，我到王钊家里，和他们全家一起吃了一顿开心饭。

不知王钊这一辈子还有没有另一次的开心！

王钊这个人才过早地走了，癌症。张陞也是癌症走的。他们要是不得癌症才怪呢。他们来到的这个世界，对他们太苛虐了。

（以上并非是北京四中1957年错划的全部右派。）

三、为文革中其他被错整的教工落实政策

四中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的教工有：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

健竹、王钊、黄庆发、张陞、周春芳、王行国、史会仁、廖锡瑞、王希哲、张佐参、张育达、郭玉如，以及曹家骏、王鑫章。计 18 人。其中学校领导干部 5 人。

四中清队先后被揪出来隔离审查的人有：历史教师朱鉴民、程富祺、萧立岩、徐健竹，语文教师廖锡瑞、黄庆发、刘承秀（女），数学教师周成杰，物理教师王钊、张陞，化学教师徐光，外语教师刘约华（女），音乐教师曹会澄，体育教师吴济民、韩茂富，职员王行国、陈南（女）、张育达、周继尧等。不完全统计 19 人。

文革运动中四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竟有 5 人之多。他们是：运动初期遭受迫害的地理教师汪含英和她的丈夫数学教师苏亭午，被轰返乡无处安身的职员田钟岳，清队中遭受迫害的语文教师刘承秀，一打三反中遭受迫害的伙食管理员刘庆丰。这还不算自杀未遂的，不算在四中被打死的校外人员。

此外，还有被抄家的，被遣返回乡的，……

这些人员除了前面已经讲的错划右派落实政策以外，都需要落实政策。

这里只讲一个例子。

王行国是文革落实政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王行国是“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红苗子”，19 岁未等高中毕业，就被四中选拔留校做团委书记。原本是什么政治历史问题都没有，却在 3 次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1958 年被下放到南郊农场劳动改造；1964 年四清运动中遭受批判，而后下放校办工厂劳动，长达 13 年；文革初期被打进劳改队，清队中再次被揪出来隔离审查。被批斗 60 多次，被拉到住家街道上批斗，被抄家。

给王行国落实政策本该是很简单的，然而却出现了“戏剧性”。

1978 年底，我代表学校党支部最早到家里给王行国落实政策，宣布他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撤销一切不实之词，销毁所有黑材料，给他彻底平反，对他在运动中受到的打击迫害向他赔礼道歉。

不料，王行国对于在档案里没有给他留下一个书面“结论”很不理解。

我向他解释：“结论”是针对问题的，有问题才有结论，没有结论就说明你没有问题。

他却有另一番道理：“理”是这样，但是，实际上还不是说你什么就是什么。再说，整你一溜够，早已面目皆非，就凭现在关起门来“给你平反”一句话，别

人谁知道？再说，过七八还要再来一次，谁敢说不会再有个风吹草动……总之，无非是挨整挨怕了，既然落实政策，有个护身符心里才踏实。

我向书记作了汇报，经支委会研究，给王行国写了一个“结论”材料，拿在手中当“身份证”。

关于王行国同志的政治结论

王行国同志在1958年双反运动中，响应党的号召，向党交心，谈了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思想活动。这本来是好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却把该同志在1958年的思想汇报，作为问题进行批斗，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实属打击迫害。现予以平反。王行国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

中共北京四中支部（盖章）

人的价值要凭别人的一张纸来把握，人的命运要凭保险柜里的档案来决定，悲哀，然而却是现实。

1978年底，王行国调离校办工厂，返回教师队伍。

1979年3月20日，学校党支部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再次给王行国平反，向王行国赔礼道歉。

四、给错划“反动学生”的学生落实政策

文革前的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在四中有一批学生被划成“反动学生”。这是一个天下未闻四中独创的“革命成绩”。

真正“四中特殊论”的实证在这里。四中一向是特殊的左，左得特殊；左得可爱，左得害人，害了几代人。

这些当年学子中的佼佼者，一旦被戴上“反动学生”这顶压死人的大帽子，档案里被塞进重若千钧的黑材料，在他们小小年龄里，就注定了终生的悲惨命运。上学不取，工作不收，只有作为“贱民”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大多则被发送到劳改农场，在劳动改造中，消逝了青春。

一个个天才就这样被扼杀，一朵朵生命的火花就这样被浇灭。

多么阴损缺德，伤天害理啊！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十几年后，当天空放亮的时候，各个方面都在为历次运动的错误落实政策的时候，却没有谁来管他们这批人的冤案，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次运动规定的挨整对象——国家好像没承认四中这项整人的独创。

没人管，我管！我无力回天，但我要运用手中的权力，尽力解除人们身上的枷锁。我找到区里落实政策办公室，人家说，学生的事不管。

后来，我从区委书记刘锦平那里找到了定心丸。他说，哪都不管才好呢，你就按政策自己办。

王云凯，当年是出名的拔尖学生，全国数学竞赛冠军获得者。高考前自己定的标准不低于 595 分，考试结果达到 596 分极高分。但因为是“反动学生”，大学不取。而后发在昌平劳改农场劳改。

我把王云凯的档案作了清理，当着王云凯的同学毛新华面，烧毁了黑材料。

现在的王云凯在努力发展个人才能，学问上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事业上，与其弟合办了个祥云公司，注册资金 2 亿，是最大的个体户。四中篮球队出访台湾，祥云资助 10 万资金。另外，祥云又向四中校友基金会捐赠 10 万资金。

毕向明，65 届学生。他爷爷被划成富农，便推论他恨共产党，恨毛主席，而成了“反动学生”，被分配到团河劳改农场。文革中农场联合毕向明家乡的人，差点没把毕向明打死。后来他找了当年在四中搞四清的工作队队长、市教育局局长李晨，李晨给他写了平反材料，说这个孩子吃苦了。

我经手给他落实政策，把他调进四中做食堂管理员。后来他又学了工民建，负责四中基建，从事建筑业务。半生的苦难，造成了他嗜酒的毛病。刚到中年的毕向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黄浩生，其父是地质学家，是在西南大学立有塑像的学术权威。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黄浩生受其影响被划为“反动学生”，被分配到南口劳改农场劳改。四中帮他落实政策，安排到 28 中教书，把他在农村的妻子安排到四中食堂工作。

钱元凯，58 届学生，在校期间被誉为“明星级的学生”。其父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受其所累钱元凯被划为“反动学生”。大学拒绝录取。他从在首钢当壮

工起步人生，多次获重大科技成果奖，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现在是中国摄影器材研究与开发专家、教授。

文革十年如一梦，沧海浮沉的梦魇，不堪回首，却也挥之不去。

人啊，不要忘记这段浑噩的历史，让正义和良知长留天地！

【事件】

北京四中“会议记录疑案”始末
——“北京市中学干部问题联络站”的前前后后

张兴生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战友——我敬爱的杨滨校长，和那些曾参与“干联站”活动的已故和健在的同学、老师和干部们。

——作者题记

开场白

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您不要笑话，当初写文章都是这么开头的。

遵照最高指示，北京四中和全市各所中学无一例外，都被破坏了：高考废除了，抄家破四旧，斗争走资派，斗牛鬼蛇神，校领导，包括很多老师靠边站，后来大串联，又破坏了铁路交通秩序，学生全“放了羊”……，要说破的已经比较可以了，可就是没看见立起什么来，立怎么不在其中呀？

转眼到了一九六七年。

新年刚过，“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不点名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题目是《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其中也发布了一条最新指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以此来论证刘少奇的反动。

这是一篇目标很明确，而且非常实用主义的社论。

看到这篇社论，北京四中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同学首先站出来，他们天真地以为，要纠正学校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了，开始不自觉地根据这篇社论反思文化大革命。说“不自觉”是指出自本能，出自于对社会现象本能的观察与思考。我就是在这批同学的感召下，投身到后来的许多活动中。

我们这些同学联络了很多外校的学生，对全市中学当时的干部状况做了统计，并写出《北京市中学干部问题调查报告》，用数字说明前一段在干部问题上不是打击了一小撮，而是打击了一大片，应该予以纠正。

《调查报告》引起了轰动，那些靠边站的干部们更是给予积极的肯定。有人说这是中学生深入社会调查，理论联系实际典范，好！但政治嗅觉灵敏的人却说：警惕呀，“右倾翻案风”来啦！

在进行干部状况调查和以后的各种活动里，我们这些同学很自然结识不少中学干部，比如二十七中的校长张迅如，女附中校长胡志涛，四中的校长杨滨，河北北京中学的贺诚，还有101中的，三十九中的，三中的校领导，现在一时想不起名字了。他们中很多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应该早一点出来工作。

就在此时，四中来了军训团。带队的是某独立团高政委。

军训团开进学校是带着崇高使命的，就是要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要让“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带着这样的重任，也就决定了他们不打算也不能够把像杨滨这样的干部解放出来，如果他们把北京四中这样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解放了，那么北京市的中学哪还有什么走资派，那岂不是资本主义复辟？

于是，在我们和军训团中间，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这个疙瘩一直到1967年的下半年，在有关会议记录疑案的讨论时，来了一个正面的大爆发。

一、“会议记录疑案”的由来

说到这个问题，必须把话题再回到当时的学校：

军训团来了，他们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组织散了摊子的学生们“复课闹革命”。复课的第一招是搞军训，进行队列训练，这对军训团来说那是手到擒来，轻车熟路。但是接下来要学一点文化知识了，这对军训团来说却是一窍不通。老一套不能用，“新”的又没有，老师不敢教，学生又坐不住，这课可怎么复？要改编教材，要摠住学生，无论如何干部和教师队伍的组织就成了当务之急。

前面说过，我们一些同学搞的那个《调查报告》曾引起轰动。不仅如此，后来还顺势成立了以我的同窗王玉刚同学为召集人的“北京市中学干部问题联络站”（以后简称“干联站”）。“干联站”第一个大活动，就是促成并成功地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北京市级的平反大会，给二十七中校长张迅如平反。那时已是1967年的初夏，下午的骄阳已经令人感觉灼烧。可尽管如此，北师大的操场上还是人山人海。会上，张迅如介绍了自己的坎坷经历，北京市革委会还派人宣读了给张迅如同志平反的决定。这次大会，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中学的干部解放工作。

按说“干联站”的活动似乎是顺应当时的大形势的，是有利于“复课闹革命”的。可是不要忘记，尽管毛主席指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毛主席还说过“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显然对于从49年解放，到66年这十七年间的学校，他老人家已经明确无误地定性为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的了。

就是这么一句话，北京市中学干部问题的解决还早着呢！同样，就这一句话，也就决定了军训团在触及四中的干部问题时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虽然他们也声称要“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但在实际上却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一个主要的干部也不敢解放。最大的勇气也就是提拔了一个食堂管理员，担任北京四中的革委会主任。而对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的杨滨，一直怀着极大的戒心，同时还不断地越来越明显地对杨滨发出充满了敌意的信号。

记得当时高政委曾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讲到学校的干部问题，原话我记不得了，主要意思是：“咱们学校阶级斗争相当复杂，据我所知，我们有的同学和某个领导干部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请你们注意，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

后来我们才知道，高政委所指的“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其实是说杨滨和我们高一年的一个同学李惠敏。那天李惠敏和杨滨外出办事，错过了学校食堂的开饭时间，两个人便在路边一个小铺子里分别买了几个包子，大概还喝了一碗粥。这本来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可是偏偏让一个左派“火眼金睛”看见了，汇报给高政委。高政委如获至宝，于是这就成了北京四中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尽管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个笑话，但是军训团的意向却再明白不过了，杨滨是阶级敌人，要警惕，要和她划清界限！

但各个学校都必须组建有教师和干部参加的领导集体，已是大势所趋。这

种形势无疑对四中的一些干部和教师也具有吸引力，很快各色人等也纷纷亮相登场。

四中有个外语老师，文革开始以来一直不露面，可是军训团来了，他却成了大大的积极分子，整天围着军训团领导转，跑前跑后，介绍各种有关四中的信息，出一些高招。他很快得到军训团的信任，被结合到领导班子里了。这么一来这位老师得意忘形，以至于得意到不管不顾，乱搞男女关系，被人抓了现行。事发之后，不但他自己颜面扫地，就连提拔他进入领导班子的军训团都有点儿下不来台。

还有一位干部，据说当时此人已是副教导主任，其实主要工作还是教师，教政治，但同时又是以前四中党支部的支部委员，是排在“杨刘俞屈”四人之后的第五号人物。此人政治嗅觉灵敏，善于察言观色。他也觉得时机到了，便以知情人的身份，上揭四中的“四家店”，下揭四中的“十六个大坏蛋”。其中最有力量的莫过于揭发了杨滨十余条反动言论。他特别强调，这些言论是杨滨在四中党支部会议上说的，会议记录就是他这位支委自己记的。铁板钉钉，铁证如山！

这个揭发确实极具震撼力，我们这些经常接触杨滨的人也不由一愣，难道这是真的？

我和杨滨的交往是因组织“干联站”的活动而日渐频繁。因为“干联站”自从在北师大开过那个平反大会之后，很多干部纷纷找上门来，表示自己也要参加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也要参加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不应该总靠边站，应该投身到运动中来。我们觉得这是好事情，于是“干联站”的活动也就日益多了起来，而且逐渐形成规律，每周五都要在四中的礼堂或是阶梯教室举办一次活动。

可偏偏这个时候王玉刚离开了“干联站”，去参加一个大型展览会的筹办，“干联站”这些活动的组织工作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杨滨是“干联站”的积极分子，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商量如何组织批判会，如何写文章等等。在接触中，杨滨从来不提文革开始时自己被游斗，被殴打那些伤心事，表现出了一个老干部宽广的心胸。而且杨滨看问题深刻，办法也多，想问题又全面，对我们帮助很大。更何况我们后来才知道杨滨来自延安，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对这样一位老同志我充满了敬意，说真的，要不是文革，也许我还没机会接触这样的老革命呢！

就是这样一位老革命怎么会说出那些反对学毛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来

呢？

不仅我有这样的疑问，很多同学也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对揭发材料的看法是：揭发材料的爆料，使矛盾激化了，要么杨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要么就是那个揭发者造谣诬陷。所以必须对揭发材料进行查证，解开这个谜团。

最直接的证据应该是那本支委会会议记录，同时支委中除去当事人杨滨和那个担任记录的支委（揭发者）以外，其他与会者的旁证也将举足轻重。

高二（2）班的部分成员任志、张育海，以及高一（5）班的李惠敏还有初三年级的孙霏等人，从查找会议记录的下落入手，做了大量细致辛苦的调查分析工作。

会议记录找到了，保存在高三（1）班一个学生党员的手里。最初怎么到他手里不得而知，但是无关紧要。当任志他们向他索要这本会议记录时，他很不合作，但是架不住对他陈说利害，最后还是交出了支委会会议记录。

接着便是分兵两路，一路是核对揭发材料的真伪，另一路则是向参加会议的其他支委刘铁岭、俞汝霖、屈大同等人，还包括列席会议的团委负责人燕纯义以及姜春荣等人，挨个寻求旁证。

经过一段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经过反反复复的慎重求证，同学们得出一个证据确凿不容推翻的结论：杨滨是被诬陷的！

下一步怎么办？

任志他们回到“干联站”商量。当时我们在一起商量的人很多，还能记起的有：张祥平、秘增凯、任志、张育海、吴长生、刘北城、陈岱林、王硕仁、李惠敏、潘鲁全、伍贻龄、张勇、孙霏、张兴生，还有王行国和林毓侠老师等（时间久远，人名可能有误）。

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召开大会，向全校公布这个结论。揭露伪造会议记录的事实真相；指定孙霏为主要发言人，还指定一些人做补充发言；张育海负责贴海报进行宣传；同时，还推举我做这个会议的主持人。

当时我们还天真地抱着一个想法，不信在事实面前军训团就永远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到底，我们一定能用事实说服他们。

我们不知道，其实在军训团方面也很重视我们这次会议，并且做了好几手准

备，一方面极力阻挠会议召开，另一方面万一阻挡不了就由高政委出面灭火。这是会议召开之后我们才知道的。

二、听证会在艰难中开始和进行

这天下午，开会时间就要到了，我和孙霏等人走向会场，四中的大阶梯教室。我的上衣兜里揣着一个发言稿，这是我和张祥平共同起草的开场白。这个小发言稿很短，但是意思很明白，强调会议记录真伪的重要性，同时支持杨滨进入四中领导班子，希望有关方面听取我们的意见。

还没有到阶梯教室，就远远看见，这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已经座无虚席，有些人进不去只能挤在门外，真想不到居然来了这么多人！

我们挤进阶梯教室，教室里只有讲台上还有一小块空地。当我站定正准备掏出发言稿时，突然，高政委出现了，来了个喧宾夺主，他要先讲几句。我无可奈何只有让他先说。

尽管高政委心里极不情愿让今天的会议举行，但他却拿我们同学到外校张贴海报大做文章，表示愤慨，企图造成今天的会议不合法的迹象：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这本来是咱们校内的事情，你们却扩大到全北京市，到处贴海报，说什么‘真相大白’，你们这是招摇撞骗！”

这是给今天的听证会当头一棒，我还从来没见过高政委如此地声色俱厉！

高政委说完，正当大伙还在发愣的时候，只见第一排齐刷刷站起一大排解放军战士。原来他们早就来到这里，等待时机开始行动。

这时他们中间的张排长（军训时间长了，我们已经能认出他们每个人了）高声喊道：“原来今天这个会议是一个给走资派翻案的会，是个骗人的会，我们解放军坚决不支持！坚决反对！我们退场！”

接着，他们向右转，一个接一个走出了阶梯教室，同时在阶梯教室各个角落里还散坐着的解放军战士用很高的频率使尽全力拼命的鼓掌，以示鼓励。

这时，又站起两个人，是外校来的，这不是事先准备的，他们是看了海报才来的。只听其中一个女声说到：“我们听解放军的，我们向解放军学习，这样的会，我们也不支持，我们也退席！”

于是，又是一阵频率很高使尽全力的掌声。

掌声过后，会场死一样安静。这时军训团期待的大概是大批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会场，然后他们再报以一阵频率很高使尽全力的掌声。但遗憾的是，再没有人响应号召了。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

看来军训团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早早来就是来拆台的，怎么办？这会还开不开？不能不开！我们都准备那么长时间了。豁出去！开始！在场还有这么多人呢！但此时应该缓和一下这种对立局面，不然会议可能进行不下去。

我努力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硬着头皮走上前去。我没有掏事先准备的发言稿，也忘了大会开始前一定要带领大家高呼万岁的法定程序，而是压低了嗓音，慢慢的，想一句，说一句：

“欢迎大家很晚了还赶来参加今天的会。其实呢，今天也算不得给走资派翻案，这只是在审查干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一种意见。”

我有些前言不答后语，但会场静极了，静得几乎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

这时我看到，由于部分军训团成员集体退场，会场第一排有很多空位子，门外一些不识趣的听众此时趁机钻了进来，把那些位子坐满。

等大家坐定，我继续想一句，说一句：

“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杨滨的揭发证据不实。今天就是要请大家听听我们的这些发现。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意见吧，供大家参考。至于这些发现说明了什么，也请大家来判断。”

说完，我看看大家，底下仍然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继续说：

“那好，下面请孙霏同学发言。”

说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让出讲台的中间位置。

孙霏走上前来在众人的注视下，开始了他精彩的分析。

首先，孙霏列举了杨滨的“反动言论”，唸了几条之后，他问大伙：“你们听听，这里哪句话不能给杨滨定罪？”接着他把话锋一转：“但是问题是，这些反动言论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能证明真实存在，那么毫无疑问，杨滨就是三反分子，但是如果能证明是伪造的呢？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说到这里他看看底下的听众，下面是一片期待的眼神。

接着他加重了口气：“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可以证明，杨滨的那些反动言论是不存在的，证据是有人伪造的！”

话一出口，台下的听众有些坐不住了，有人交头接耳，似乎在讨论着什么。

这时孙霏放低了声音，继续说到：“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了揭发材料的第一手证据，四中党支部支委会的会议记录。据说杨滨的反动言论都记录在这些会议记录里。但是在核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一条言论都是经过那个支委涂改或者是后加上去的，而且涂改或后加的痕迹非常明显，用肉眼都能看出来。”

底下的听众已经不再交头接耳了，而是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听孙霏说下去：

“请听这一条，这是 65 年 1 月 7 日，杨滨说……”

孙霏唸了一条反动言论。

“这一条所在的地方显然是用橡皮擦过了，我们曾拿起这页，对着亮光看，反动言论所在之处明显的比周围薄了好多，几乎擦破，但是这句反动话就偏偏写在上面。我想问问大伙，作为会议记录，会议进行的时候有可能用橡皮涂改吗？如果写错了字，顶多当时用笔划掉，再写上正确的，也不可能用橡皮擦了之后，再在上面重写。更何况，这又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会议当中根本没有时间和可能完成这么复杂的动作，这不符合常理，只能是后期进行的涂改。”

这时会场上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长长的赞同声：“嗯——！”

孙霏接着说：

“除了那些被涂改后加上的句子，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位支委做记录有个习惯，当每换一个发言人时，在记录上都要空一行，也就是前一个人说的话记录完了，空一行，再记录后一个人说话的内容，而且这些记录从前到后都遵循这个习惯。

奇怪的是杨滨的很多反动言论都出现在杨滨的最后一句，偏偏都出现在那些原来是空行的地方，杨滨的反动言论记录完，空行也就没了，紧接着就是下一个发言记录。”

说到这里，孙霏停顿了一下，然后抬高了声音，对大家说：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不仅空行没了，记录这些反动言论所用的钢笔水和其

他一般的记录所用的钢笔水颜色也是不同的，一般的记录用的是蓝黑墨水，而那些反动言论用的却是純蓝墨水！”

此时台下的听众一片哗然，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掌声打断了孙霏的发言。

等大家稍稍安静了以后，孙霏不乏幽默的说：

“我很佩服做会议记录的这位支委同志，能在会议当中，及时更换钢笔水的颜色，专门记录杨滨的反动言论，记录完了再及时更换钢笔水做一般的记录。”

台下报以会心的微笑。

孙霏把那十几条反动言论的出处一一做了分析，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杨滨那些所谓的反动言论是不存在的，证据是后来有人伪造的！”

话音刚落，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听众的情绪已经完全被调动了起来，开会前高政委的当头棒喝，和军训团部分成员集体退场所造成的压抑气氛早已不翼而飞了。

接着孙霏还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会议记录。他告诉在场的人们：排除了当事人杨滨和那个支委的意见以外，所有其他参会人员都表示，对揭发出来的那些反动言论，没有任何印象。同时孙霏还引用了一位支部委员的原话：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场合，听到有人说那种反动言论，觉悟再低也都会有所觉察。尤其说这些话的又是杨滨，又是在支委会上，当场就应该站起来和她理论。但我们确实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

也就是说，从侧面又一次证明那些所谓的反动言论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后来有人强加上去的。

这时的会场已经开始沸腾了，大伙纷纷站起对孙霏的发言给予肯定和支持。

突然，挤在门外的张育海要求发言，他往里挤了挤，大声说：“现在事实已经清楚了，杨滨是受诬陷的，杨滨是清白的。那个揭发人应该站出来，主动承认错误！”

他的话音刚落，屋里所有人一下子把目光移到了那位写揭发材料的支部委员身上。

我其实早就看到他了，他早早来到了会场，只是躲在一旁，用胳膊肘支着下巴颏，闭着双眼，一言不发。

还真应该佩服此人的心理素质，那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现在见有人点了他的名字，便睁开双眼，慢慢地站起来，不紧不慢，一个字一个字毫无表情地说道：

“我郑重的表明我的态度，我坚持我原来的揭发。关于我，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考察。”

看来这两句话早就准备好了。我一下明白了他说话的弦外之音：你们说的不算，要军训团说了才行！

但是，大伙不买他的账，仍然是七嘴八舌地指责他。

此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不能转移会议主题，目的已经达到，应该赶快结束。当我正要宣布会议结束时，高政委又上来了，他直奔讲台要发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三、高政委一瓢冷水泼下来，人人来了个透心凉

我没有记录高政委的原话，但是他讲的几个要点我是记清楚了。

第一，他极力贬低同学们对揭发材料真伪调查的认真态度。高政委说：

“其实用不着你们这么费劲对那份会议记录进行分析，是真是假做一个技术鉴定就非常清楚了。”

听了这番话，我有些困惑，既然如此，军训团为什么不做？那些材料对打倒杨滨是多么的有利，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莫非你们也怀疑那些揭发不实，弄清楚了反倒对你们打倒杨滨不利，还不如糊涂些好？

第二，高政委明确表示，杨滨其人已经定性了，就是要打倒，这一点已是铁定的。那个揭发材料已经不重要。高政委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

“其实，在杨滨问题上我们一开始也吃不准，这样一个老同志，让我们很为难。但是后来我们的上级领导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北京市的中学干部都解放了，也轮不到她杨滨！那些揭发材料已经不算什么，真也罢，假也罢，都改变不了对杨滨的结论！”

噢！看来军训团是铁了心了，我们做的这一切都白费了！

第三，高政委表面上不偏不倚，但是对那个揭发人实际上是进行了保护。

高政委说：“既然揭发材料已经无足轻重，因此就没有必要纠缠揭发人和被

揭发人谁对谁错了！而且，杨滨是杨滨的问题，揭发人是揭发人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就这样“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会议记录这件事从此也就没人再提起。而且越往后，出于安定团结以及和谐社会的需要，一直到现在也没人再提起。会议记录最后的下落也不得而知。

会散了，大伙离开教室，各奔东西了。

杨滨解放之日已是遥遥无期。刚才会场上燃起的希望之火，被高政委一桶冷水泼下来，一下子浇灭了，人人来了个透心凉。

只有顾德希老师的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在走出阶梯教室的路上，顾老师对我说“今天你们的会能开下来，就不错啦！”

之后，无论是哪个学校，凡是来过“干联站”的中学干部，都要做检查，要深刻检查自己的动机，否则就甭想被“三结合”。我呢，也不敢组织“干联站”开展什么活动了。随着批判“干联站”的风声越来越紧，好友汤池劝我：“苗头不对，走吧，别在学校呆着啦！”于是我就报名到内蒙插队去了。其他同学也陆续走了。

我们跑了，杨滨们的苦难还在继续……

结束语

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干联站”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这个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我，尽管我是亲历者，但是却迟迟找不到答案。

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干联站”是在文革初期出现的，以北京四中学生为核心，以《北京市中学干部问题调查报告》为根据的，有北京市众多中学干部、教师自愿参与的，以串联会形式活动的自发的群众组织。

它的思想基础是对广大中学干部、教师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不满，因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干联站”的活动是广大中学干部教师对自己不幸遭遇的一种抗争，有悖于传统的逆来顺受，因此引起了当时掌权人的敌视，也因此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劣势。

围绕会议记录真伪听证会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这种抗争与被镇压的集中表现。

而四中的学生之所以能在这个松散组织里处于核心地位，自然而然地担当起小小的“历史使命”，不能不归结于四中这所学校的优良传统。四中学生善于独立思考，这得益于四中的始终如一的民主教学思想，四中的学生爱较真儿，这是得益于四中一贯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因此每当我想到四中的校训：“勤奋 严谨 民主 开拓”时，便有着无数感慨，这不仅仅是治学，而更重要的是育人呀。

（作者说明：那次听证会的时间一说为1967年7月15日，一说为同年12月19日，确切时间待考。）

【访谈】

“中统特务”三十年

——朱鉴珉访谈录

赵之洪

受访人：朱鉴珉

主访人：赵之洪

时间：2011-12 至 2012-2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教工宿舍 朱宅

主访人按：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人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审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文革”中审查的严酷，更是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按惯例，审查结束后无论被审查者是死是活，一般都要给其“政治历史问题”做一个书面的审查结论——“是”也；“否”也——经本人签字，载入档案。这是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人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是何人发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堂而皇之地登上台面并被广泛应用，成为被审查者的政治结论里的关键词（一说源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大搞“抢救”之时，康生等人匠心独运的首创，并得到毛泽东深思熟虑的首肯——确否待考）。此八字可谓扑朔迷离，“政治历史问题”究竟“是”焉？究竟“否”焉？如此“结论”，云山雾罩掩盖着的是生杀予夺者的权谋之策，其对人的戕害，对国家乃至中共自身的祸害，已被无数“实据”所证明。

笔者曾就读于北京四中，目睹过该校文革的全过程。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以“政治历史问题”遭到隔离审查，被轮番批斗的教工多人，其中包括历史教师朱鉴珉。据悉，从1949年到1970年，朱鉴珉历经不同地点、不同等级、不同形式的多次审查，在1978年和1980年由不同的审查者做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其卅年压抑，一朝解放的经历，对人们反思解放后的政治运动，颇具样板意义。

应《记忆》编者之约，笔者近日对朱鉴珉老师进行了多次访谈。现将他的追

忆辅以我的议论一并成文，以飨读者。

赵之洪（以下简作“赵”）：朱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文革肇始，1966年夏红卫兵暴乱时期，您并未被冲击。

朱鉴珉（以下简作“朱”）：是的。我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并遭批斗、劳改，是1968年至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阶段。

赵：罪名是什么？

朱：“特务”，硬说我是“中统”特务。

赵：据我所知，“中统”特务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是专政对象。那么，您是怎么和“中统”挨上边了呢？

朱：话还得从头说起。上世纪40年代，我在家乡无锡上小学，校长叫蒋震。1948年，我17岁，正上高一。11月一天的下午，蒋震以老校长的身份，召集包括我在内的12名小学校友到一家照相馆开了个会。其间蒋震言语晦涩，支支吾吾，似乎很谨慎。不过能听得出来，他是想叫我们参加一个涉及政治的组织，但并未提及与“中统”相关的任何名称，我当然也并不知道他与“中统”的关系。偏偏我这个人一向痴迷于文学，于政治了无兴趣，对此话题顿感索然，便推托说要回校吃晚饭，于中途退席。蒋似乎也没有强留之意，我便一走了之。其余11名校友的情况不得而知，之后各奔东西，也从未就此事有过什么交流。直到解放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蒋震被逮捕判刑，我才得知他是“中统”特务。

赵：您对政治没兴趣，但照相馆开会一事却为您解放后的政治命运埋下一个伏笔。

朱：可以说是所谓“事出有因”的那个“因子”。我1952年高中毕业时，和全苏南的毕业生一起集中学习半个月，动员报考师范，并要求写自传。

赵：解放初期，领导所要看的自传内容，是有特定政治指向的，就是要如实将自己解放前与共产党的敌对势力沾边的政治行为交待清楚。

朱：我当时并不懂得什么“政治指向”，只是在自传中忠诚老实地将照相馆开会，自己不明就里，中途托辞退席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写清楚，交了上去。

赵：有什么反响吗？

朱：没什么反响。我顺利地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并加入了共青团。从

那时到 1956 年毕业后留京工作，再也没有人向我提起过照相馆开会一事。

赵：我想，这大概是短暂的平静。

朱：对。1957 年到 1962 年，我在北京幼师工作期间，开始经常有人来找我谈话，全都是了解解放前照相馆开会一事。这些人都是当初与会的其他 11 名校友的工作单位派来的，叫做“外调”。我想，按组织原则，这些外调者在找我之前或之后，肯定会和幼师的党支部说明情况，但党支部书记等人却从来没跟我提起过。

1958 年秋的一天，幼师领导让我到位于刘海胡同的西城公安分局报到，说是去“学习”。到了那儿以后才知道，仍然是和解放前照相馆开会一事相关。

赵：到公安局“学习”，说明调查或审查的力度升级了。我以为，从您写自传，到专政机关介入审查，6 年间呈现着一根起伏状、松紧状的线条，是和国内的政治大气候相吻合的。

朱：在公安局我又把自传内容反复地述说和书写。关了整整一周后的一个晚上，公安人员告诉我：“你‘毕业’了，回去吧。”其他什么话都没说。我匆匆回到家已是半夜时分。次日，我去问校长和书记，莫名其妙地叫我去“学习”，到底为什么？校长孙岩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她闭口不答我的“为什么”，只说：“你去理个发，洗个澡，休息两天。”书记则说：“我们是信任你的，让你教党史，做班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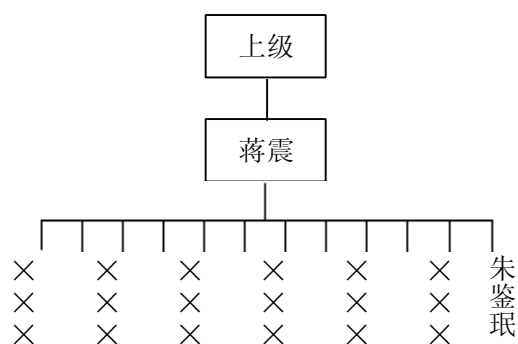
赵：看来，“中统”问题仍是个悬案，当时如果能够定案，您可能就回不来了。据可靠记载，“反右运动”之后，北京市中小学教工曾被集中清查“历史问题”，一批“够线”的教工，如涉嫌国民党特务、军警官员等，都随右派被下放到农村劳改，有的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再也没能返回学校。

朱：说明那时公安分局和幼师领导政策掌握得好，还是比较实事求是。1962 年，我从幼师调到北京四中。1964 年，“四清运动”告一段落，工作组撤离后，留下和幼师的孙岩同样资历的杨滨任书记兼校长。一次，因别的事我去找杨滨，谈完后杨滨忽然问我：“还背包袱吗？”我意识到是指解放前照相馆开会一事。她明确地告诉我：“不用背（包袱）了，弄清楚了。”后来文革中劳改，和杨滨一起在雪地里捡煤核时，她又悄悄地重提此事。我才得知，“四清”时“背对背”审干，工作组曾派人找到劳改中的蒋震了解情况，他坚称“我们没有发展朱鉴珉。”

杨滨才有了以上的表示。遗憾的是，无论公安局的审查，还是“四清运动”的审查，都没有给我一个文字结论，而我也以为口头上说说也就行了，放心了。

赵：没有文字结论，恐怕皆缘“事出有因”，拿捏不准，却又不肯或不敢否定这个“因”，从而埋下祸端。不过，我倒是相信即便有文字结论，文革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思维模式达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肯定也要被推翻。

朱：果不其然，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伊始，我就被纳入小学习班，基本上与群众隔离了。专案组派人去外调，再次找到蒋震，并拿到其亲手书写的一份东西（见下）。我即被揪出来单独审查，日夜有“小将”看守，不得休息，再加上专案组成员刘文明和革委会负责人周春芳等人穷凶极恶、声色俱厉地轮番审问，精神上备受折磨，前后达4个月之久。



赵：蒋震写的这份东西您看到了吗？

朱：在把我揪出来的群众大会上亮给我看了，他们以此作为“铁证”，硬逼我承认加入过“中统”组织。其实这只是解放前照相馆开会参加人员的名单。于是，我再次将照相馆开会的过程，以及解放后写自传，公安局“学习毕业”，“四清”审干“弄清楚了”等等，反反复复地说完了写，写完了说，不厌其详。但结果终被冠以“不老实”、“顽固不化”的帽子而过不了关。

赵：当然过不了关。专案组或者说被政治运动裹挟的“革命群众”的思维逻辑是，你是理所当然，板上钉钉的中统特务，历次审查在“旧市委”、“走资派”包底下得以蒙混过关，潜伏在教师队伍中。蒋震的亲笔所书让办案者沉浸在抓到一条漏网大鱼的兴奋中，哪里还有心思去寻找或挖掘旁证。“疑罪从有”的意识和规则，在“不漏掉一个坏人”的方针指引下，达到空前的强化和固化。另外，

在当时残酷的高压下，为了蒙混过关，蒋震是否仍在一如既往地强调“我们没有发展朱鉴珉”，也值得怀疑，甚至不能排除四中的外调人与当地的掌权者共同施压，逼迫蒋震“封口”，不许乱说乱动，否则罪上加罪。根据诸多后来披露的材料，此等冤案不计其数。大到对刘少奇历史的审查，小到对普通“国民党员”的审查——不是有这样的案例吗？国民党某县党部书记为独占党的经费或私吞空饷，竟编造党员花名册，将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甚至十几岁的孩子列入其中。而这些人却被蒙在鼓里，万万没想到自己曾是在册的“国民党员”。“文革”中仅凭这本花名册，多少人被冤屈，百口莫辩——区区“国民党员”尚且如此，何况您这个“中统”特务！

朱：叛徒、特务是打击的重点，四中揪出个特务是了不得的事，是特大“战果”，从步步升级的审问就可以感觉到，专案组甚至无中生有，已经把我是特务的结论搞定，就靠逼供信拿到我的口供，铸成铁案了。刘文明咄咄逼人地喊道：“已经可以定你的案”，“你是怎么混到首都来的？”“你是怎样混入团内的？”“必须把你这个钉子拔掉！”后来还警告我：“你可别走王行国的路！”这“王行国的路”是什么路？我只是听说王行国留校做团委书记不久，1958年积极响应号召“向党交心”，说了一些心里话，反右、四清遭受批判后，分别被下放农场、工厂劳改。四中党支部一直把他当做“右倾分子”，打入另册“内部控制使用”。从文革初期直到“清理阶级队伍”，他更是以“漏网大右派”的罪名，遭到反反复复地毒打、批斗，却死不认罪。如此说来，王行国莫非已被专案组打入“死牢”？那么，我的下场肯定是步其后尘，死路一条了！

赵：殊途同归，您和王行国都是向党忠诚老实地说了实话，才惹来这么大的祸。难以想象，一个20岁上下的青年学生，怀着对执政党及其在本地区或本单位代理人的满腔热情和信任，将自己一颗虔诚的赤子之心和盘托出，力争自省以求得“同心同德”的境界，竟被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罗织罪名，鞭挞蹂躏后逼于绝境。据大量的当事人回忆，经历如此遭遇的绝非您和王行国，20世纪中叶中国大地上演出过大大小小多幕似曾相识的荒诞剧。

朱：我当时的心境真可以说是悲愤交加，无处诉说。但我认准了一条，坚决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口供始终没有丝毫的松动。后来“复课闹革命”，又把我和其他被关在“牛棚”里的教师交给学生批斗，在“打倒中统特

务朱鉴珉”的口号声中，先后被押解于15个班级遭“主斗”或“陪斗”。我特别注意到，除震天响的空洞口号外，我的“特务罪行”并没有人拿得出来给予声讨。

赵：看来没有再挖出新东西。

朱：好像是1969年夏，工宣队宣布解除隔离，我可以回家了。接着又召开了一个“见群众会”，让我“回到群众中去”。会前，工宣队告诉我要写个检查，“就照你所说的写，明天开大会，你不要一听群众呼口号就改口”。此话让我心里有了底。因为几天前我与工宣队谈话，再次斩钉截铁地表示：“我面对毛主席，面对工宣队，用最明确的语言说：我参加了照相馆那次会，中途退席，没参加他们的组织。”在次日阶梯教室的大会上，我重复了这段话。有人还是站起来领头高呼：“打倒中统特务朱鉴珉！”我没有理会，工宣队已经给我交了底。

赵：也许这是一种策略，“红脸”、“白脸”兼唱。你的辩白放在那儿，审查告一段落，问题暂时“挂起来”，先“回到群众中去”。借用当时最为流行的说法：“斗争远远没有结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随时可以给你戴上帽子。”

朱：你说的对，“见群众会”结束，依旧没有一份文字结论。“回到群众中”，基本没有正常上过什么课。先是到工宣队的派出单位运输公司当装卸工，后又去“五七”干校，再就是反复地随同学生“拉练”和“三夏”劳动。

赵：显然，以体力劳动继续作为惩罚手段。

朱：最要命的是心境的恶劣，在这样的郁闷中我实在不愿再在四中呆下去。1975年，我提出调动，工宣队可能也体察到我的心情，很快就同意了。于是我调到海淀区的一个中学。

赵：您就此离开四中，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四中给过一个说法吗？

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落实政策，燕纯义在四中负责这项工作。一天，他通知我回四中谈落实政策的问题。我满心欢喜，以为四中再经调查，终于能够得出一个实事求是，还我清白的结论了。没想到他拿出的几页文字，标题赫然在目，居然还是“关于朱鉴珉中统特务问题的结论”。我失望至极，根本没有往下看，只愤然说了一句：“我没有中统问题！”即拂袖而去。这是我最后一次踏进四中的大门。

赵：您没签字，也就是说，在四中并没有完成落实政策的全部程序。

朱：四中的这个结论，标题仍然冠之以“朱鉴珉中统特务问题”，为什么不

以“否定朱鉴珉中统特务问题”或“朱鉴珉不是中统特务”为题呢？他们肯定没有进行负责任的重新调查，仍然是围绕着文革专案组整出的材料兜圈子，最后拿“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类的套话做文章，言外之意还是坚持整你没错。这是我无论如何难以容忍，不能接受的。

赵：既然“查无实据”，那么罪名就不能成立。所谓“事出有因”，显然是为整人者乃至整人的政治运动寻个台阶，找个借口而已。

朱：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意想不到的的是我的生命中遇到一位真正的好人，是他让我的政治遭遇峰回路转，头上高悬着的特务帽子被他彻底粉碎了。

1979年，我已从海淀区调到北京景山学校。一天，一位不认识的男同志到家里找我。他自我介绍名叫唐晓峰，来自沈阳。他再次向我提起解放前照相馆开会一事。原来他是当年与会的12名校友中，一个黄姓校友工作单位的同事，他正在为给此人“落实政策”做新一轮的专案调查。唐晓峰告诉我，12名校友中，除一人是蒋震的妹夫，已亡故外，其余11个人均健在。难能可贵的是，他已走访了每一个家庭，见到了11个本人及他们的家属，到我这儿是最后一站。

唐晓峰在调查中发现，此案疑点重重，蒋震欲拼凑的是一个所谓“学运组”，12个人的特务问题都没有实证，解放后都同样遭到一系列的审查、逼供和批斗。他抱定要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的决心，到无锡市公安局调档，一定要公安局拿出有关12个人曾是“中统”特务的敌伪档案。他明确指出，无锡解放时没有遭到炮火的袭击破坏，敌伪档案保存完整。在无锡市公安局蹲了整整6天后，唐晓峰最终拿到公安局做出的结论，白纸黑字，彻底否定12个人的“中统”特务问题。

唐晓峰在无锡市公安局说过这样一句让我久久震撼的话：“你拿不出档案，说明国民党都没承认12个人是特务，难道共产党倒非要承认他们是特务吗？”

赵：此话掷地有声，以反证法证明“文革”中特有的专案审查并定案的荒谬。专案组奉行“疑罪从有”，凭着只言片语的“材料”或支离破碎的线索，费尽心机将其坐实，甚至唯恐查出的“证据”削弱定案的“分量”。而唐晓峰却坚定不移地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断然否定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不实之词。

朱：尤其让人感念不忘的是，唐晓峰本来的任务是调查本单位的同事，任务完成后即可交差。但是，他从同事一个人的冤屈，进而联想到另11个人的命运，

锲而不舍地挖掘第一手材料，还清白于每一个被冤屈者。

赵：唐晓峰的所作所为当然可以说体现了一种自觉的政治责任感，但我更以为这是崇高的人性光辉的具体体现。必须承认，在残酷并轮番的政治运动中，人几乎都成了“斗”字当头的政治动物，人性被一步步地扭曲、异化，进而泯灭。

朱：1980年的一天，景山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对我连声“恭喜”、“贺喜”，并让我到支部办公室。进门一看，唐晓峰也在。他带来了无锡市公安局正式出具的“否定朱鉴珉中统特务问题”的最新结论，我百感交集，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又眼看着副书记将这几页费尽周折，来之不易的文字放入档案袋。一直在一旁的校党支部书记（曾经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是班党支部书记）指着我说：“他那点儿事我们上学时早就知道，他那时才17岁，又过了好几年了，没有算回事！”

至此，我真正步入了春风得意的人生佳境，在景山学校执教直到退休。

附记：本文必然地提到一些当事者，除的确忘记的以外，都以真名实姓记之，只为实事求是地保持历史和时代的原生态，绝无翻历史老账以泄愤之意。40多年过去，其中有的人已逝去，有的人依然健在。在此谨祝健在者安享晚年！

【述往】

北京四中的三度春秋 ——记忆中的71届3连4排

战嘉怡

1968年10月踏入四中校门，1971年11月走向社会，初中三年啊，学工、学农、学军、政治活动……，十五、六岁本应长身体、长知识，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就这样被“革命”挥霍。

可这段人生经历又那样难忘，每每中学同窗相聚，总有二、三十年未见者，然亦如昨日分手，但见半百生涯，大脑数据库深刻记忆当属初中三度春秋。

一、 入学

四中百年，育学子三万之众，桃李天下，学校始于1907年清末顺天中学堂，解放后更名北京市第四中学，四中自创建，一直以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居首著称，在京城提起四中，没人不知，无人不晓。

四中如今已是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的主要生源，进过四中大门的学生中，日后成为党政、科技、文艺、实业各界的精英或栋梁者为数不少，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对外友协主席陈昊苏、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北京市人大副主任陶西平、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著名青年学者于丹……

当旁人悉汝乃四中学子时，总会羡慕有加，然余等心中酸涩惶恐。在文革那特殊的年代，大拨轰进去，闹完革命，又整拨送出来，实难堂而承之。当然，71届亦也有少数作为者，为张艺谋、胡攻等名导做过摄影的三排迟小宁，电视剧《水浒传》中卢俊义的扮演者九排王卫国……

我们这代人啊，出生时赶上经济冒进，成长时赶上自然灾害，求知时赶上文革动乱，深造时赶上高考门槛，涨工资时赶上学历职称，刚稳定时赶上内退下岗，唉，想要有人生的辉煌，实在难啊……

文革前四中乃“塔尖”学校，除学习成绩佼佼者外，许多干部子弟就读四中。入校时，批判刘邓大会上知道刘少奇、陈云、陈毅、薄一波等之子（刘源、陈元、陈昊苏、薄熙来）都在此读书。陪着爸爸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林立果也是四中学生。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1966年夏，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破四旧”、“揪斗走资派与黑五类”、“大串联”，等等，大学生、中学生成了革命的急先锋，小学生则统统“放羊”回家。

随着文革的进展，“停课闹革命”的严重后果凸显。1968年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全国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孩子们陆续从大街小巷回到校园，教育要革命，中学生招生取消考试，一律就近入学，就这样，好的差的，男的女的都进入了响当当的名牌男四中。我们从小学四年级直接蹦到初一。

学校就近入学的生源范围，由厂桥向北延伸到正觉寺、筐箩仓，东至德内大街西侧，南至爱民街，西至新街口南大街东侧，其中有几个大院的孩子比较集中，学校斜对面北医宿舍大院、百花深外的北影大院、航空胡同的军区大院、三不老胡同的民主党派家属大院。

四中校园面积不小，东起西什库西至西黄城根。学校的前门在西什库，西洋风格的青砖铁栅，十几年前学校翻建时被拆掉。后校友捐资在校园操场南端重建，成为四中的标示性建筑。门楼上“北京四中”四个大字乃文豪郭沫若所书。

元代定都北京，京城分三层，宫城、皇城和都城。宫城就是现在的故宫紫禁城，东安门、西安门内为皇城，东直门、西直门内为都城。紫禁城是皇上住，皇城在元代和明代主要是料理皇上起居的几万个太监居住，有禁军把守，百姓不能涉入。清起，皇亲、重臣开始携眷入住皇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胡同。清末，皇城内开始允许百姓居住，可随意出入。民国初年，皇城的东、西、北三面墙基本拆除，皇城根改称黄城根。

四中所在位置就是在皇城的西北角，元代为后妃所居兴圣宫，元末战火夷为平地。明代在北依着皇城的城墙，建起皇家库房，有甲、乙、丙、丁、戊、承运、广盈、广惠、广积、脏罚十库，称“西什库”，乾隆年十库并为三库。

校门北侧旁门为体育场大门，好似碉堡，曾在电影《青春之歌》中作为北平警备司令部的外景地。

在文革年代，部队大院、各大院校、党政机关等在庭院内都塑有高达数米的毛主席全身雕像，小一些单位至少要有毛主席画像。四中校门内立有毛主席画像。所有师生进入校门第一件事是手挥毛主席语录高呼三遍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其实当时人们舞动小红书时也觉得傻傻的，极尽敷衍。为此，曾有一段时间，各排红卫兵轮流到毛主席像前执勤督查。

影壁后有一典型的四合院，原来是校长室，当时是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办公室，四中校园内目前保留的遗迹只有这个四合院了。

跨过月亮门是中院，东边为教师宿舍，西边是老三届的学生宿舍（后为教师办公室）。后院东侧是实验教室，中间是阶梯教室，西侧是校办工厂和小操场。校园西侧南北走向是食堂、礼堂，校园北侧是教学楼和大操场。

四中身为名校，但校园校舍十分简陋。教学楼估计是五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盖的，是一非常简陋的二层筒子楼。学校没有暖气供应，所有房间都是火炉取暖，当时学生们轮流值日除了搞卫生之外，冬天还要负责生炉子。有时赶上值日的同学不会生火，大家只好挨烟熏和受冻了。王建国最会生火，调皮捣蛋的他能受到表扬也多是帮助别人生炉子。

操场四周杨树与洋槐构成一圈绿林，操场地面是沙性黄土，践踏未及之处绿茵丛生，片片马齿苋、刺蒺藜、白头翁盎然。绕着黄土操场有一个四百米黑灰色的炉渣跑道，南端在教学楼前有一个砖石建的主席台。那个年代操场是不以体育运动为主，主要是两个功能，一是队列练习，二是用来召开全校大会。

召开年级大会有时在中院院子里或学校礼堂，多数是背着椅子到学校对面北医礼堂。现北大医院一部那时是北大医院职工宿舍，原是一个大宅院，亭台楼阁水榭池塘甚是规模，应是个王府。庭院门口有一座陈旧的大礼堂，在这里，十三、四岁的孩子们鹦鹉学舌般地声嘶力竭呼喊“打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对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1968年我们还未入学前，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进驻学校，

已经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周春芳作为教师代表出任了革委会主任，主抓教学工作，头戴了一顶八角呢子帽，一身褪色的蓝布中山装，裤腿吊的老高，瘦瘦高高的他在当时是学校里出镜率最高的人。

那时全国各行各业都是军事化编制，在工厂，车间为连，小组为班；在农村，大队为连，小队为排。学校也不例外，年级为连，班级为排。71届新生连（后改为三连）共十个排，几个月后十排解散，学生分插到其它排，刘剑兵、冯存华、周至、郑贝红、许京云等就是十排分过来的，六排的班主任从俭滋为连指导员，八排班主任齐大群为连长。

当时老三届尚未分配，新生连各排都分来辅导员，新生课后活动都是由辅导员负责。四排分来的白白的吴仁侃（老高二）和黑黑的洪林（老高一），没几个月，他们就插队到延安去了。就在此间，一次课后他们领着同学们互相“谈心”彻夜未归，寒冬雪夜，教室漆黑，炉火融融，女生们在教室前半部，男生就在教室后截，新奇好玩。困了，趴在桌子上睡了半宿。自然翌晨回家少不了家长一顿骂。

开学没几个月，班主任李之绥教师患病住院，则由李振波接任。李振波个人卫生不敢恭维，为此常常受到学生们的讥笑。初二时，三排的班主任之一程美至调到我排任班主任，接替了李振波。

二. 文化课

仓促复课，教材、教学计划都没有，开学后学校只好安排队列练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锻炼身体，建设祖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喊着口号，横列、纵队，齐步、正步，在大操场上回返往复整整一个月。

课虽复，“闹革命”仍是主旋。1968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当时复课闹革命，主要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要狠抓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回首中学三年，文化课的时间不及1/3，其余的时间不是学工、学农、学军，就是各种政治活动。

就是少得可怜的文化课学习，从课目设置到教材内容，也都深深打上政治革命的烙印，请看初一语文课本的目录——

一，毛主席诗词四首

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

七律 长征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

三，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四，心里有个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五，祝毛主席万万岁

六，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

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

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

九，在震撼世界的大喜日子里

十，无产阶级革命派誓做拥军的模范（《人民日报》社论）

十一，斥“剥削有功”的反动谬论

十二，收租院解说词

十三，红灯记（革命现代京剧）（第五场）

十四，毛主席对全国全军的伟大号召

十五，峥嵘岁月稠（节选）

十六，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汇报》社论）

十七，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十八，纪念白求恩（毛泽东）

十九，愚公移山（毛泽东）

二十，彻底地亮，狠狠地斗，坚决地改——李文忠同志生前思想汇报提纲

二十一，生为毛主席战斗，死为毛主席献身

二十二，铺路

二十三，破私立公，一心革命——蔡永祥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笔记日记摘抄

生物课改为农业基础课，课本里是小麦、水稻、玉米种植的内容，如何育种，几时分叶，何时灌浆等等。校园里种植棉花、茄子等农作物。物理课、化学课合

并改为工业基础课，开门办学到了校办工厂的车间里。语文课不是写大批判稿，就是歌颂祖国大好形势。英语课除了26个字母之外，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几句政治口号。

【决心书】“巍巍群山在欢呼，滔滔大海在歌唱，我们纵情欢呼，我们纵情歌唱，歌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四排全体战士（战嘉怡执笔）

【检讨书】毛主席语录：……自己身为一个红卫兵委员，可却带头没参加开练，这说明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放松了思想改造，我有决心今后再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请看行动吧。

——红卫兵战士王向红

【挑战书】最高指示：……当前我排形势一片大好，我们也不甘心落后，我们要向本班男生挑战，……看谁毛著学得好，看谁教育革命打先锋，看谁革命劲头足，看谁三八作风过硬。希望男生积极响应。

——一班全体女生（闪莹执笔）

类似这样的决心书、批判稿、学毛著心得等，甚至检讨也就成了作文习作。

一次刘剑兵带领几个班干部逃课跑到值班室去睡觉，工宣队责令几个人共写一份检讨。当时正值学哲学高潮，侯梦会、战嘉怡二人便把一分为二、内因外因、坏事变好事等概念都写进去，工宣队阅后感觉甚好，还安排刘剑兵在全连大会典型发言。

在以“大老粗光荣”世风的影响下，不完成作业，上课不听讲，下位子，打闹起哄成了课堂上的正常现象。四中的老师们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用他们的心血滋润哺育着干涸土壤上的孱苗。虽然中学三年文化课时寥寥可数，但有幸得到了名师大家谆谆教诲，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在政治压倒一切的高压下，老师教会了我们勾股定理、门捷列夫周期表、牛顿定律、元次方程、语言结构……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一生事业的奠基石。真可谓：痛哉，文革动乱湮毁年代三年；

幸哉，名师启蒙教诲受益终生。

教过我们的老师有几何老师周长生、语文老师廖锡瑞和程美至、数学老师张智慧和物理老师栾玉洁、生物佟生馥、化学老师徐光、英语张惠珍、体育迟文德和韩茂富、音乐曹会澄、历史“花鼻梁”老师（老师患白癜风，学生不敬绰号）等，他们无不为我们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更为难得的是物理老师张陞，头负右派帽子的紧箍，还要承受学生的批判与谩骂，然能尽心竭力地教学，实在不易。课间休息，男同志常常围着张老师，央求来一首“乌苏里船歌”，那深情浑厚的男中音总是博得满堂彩。

程美至老师带我们排的时候也就三十出头，班主任的工作要求她早上早早来与学生们一起队列练习，班后甚至是晚上要挨家地做学生家访。脱坯、挖沟、割稻、拔麦、拉练、游行要与学生一样。可她上有年迈婆婆，下有几岁的娃娃，丈夫又体弱多病，家庭负担很重。无奈她只好常常把孩子今天放在这个学生家，明天放在那个学生家，那时的班主任可没有一点额外的经济补贴啊。

三．天天读

“早请示，晚汇报”是当年天天必行仪式。每日清晨，工人在车间、农民在地头，学生在教室都要肃立毛主席像前，手捧红彤彤的宝书高呼“两个敬祝”，高唱《东方红》，然后学习《毛选》或《毛主席语录》，用以指导即将开始的一天工作或学习。下班、收工、放学，再读几段语录，反思检讨一天的行为，最后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主席语录》是从毛泽东著作中摘出名言警句选编于一册，共427条，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语录》外套红色塑料皮，时称“红宝书”，人手要一册，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林副主席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的书一天也不能不读”。当年《毛主席语录》每人要随身携带，便于随时随地学习。

作曲家劫夫等还将一些毛主席语录谱成歌曲，高唱语录也是当时学习的一种形式。劫夫曾创作很多传唱几十年的主旋律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二小

放牛郎”、“毛主席最亲”等，最终却因谱写“紧跟敬爱的林主席前进”而淡出历史舞台。

1968年“红海洋”已被制止，但所有的载体，街头巷尾墙壁上，家具上、茶杯上、脸盆上、书本上、信笺上依然印有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像，机关的办公室、工厂的车间、学校的教室、旅馆饭店、以及家中都贴有毛主席画像或语录。

在校三年千日，每天第一节课均为“天天读”，全体起立高唱《东方红》和两个敬祝，然后由班干部带领大家针对班里存在的问题，选择毛主席语录若干，齐声朗读45分钟。语录262页翻过来掉过去，绝大多数段落当时都能背诵如流。《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每人都要熟背，林副主席要求我们“老三篇最容易读，学了就要用”。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了问题，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学习毛泽东思想讲求的活学活用，对谁有意见了，就来段“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力武器……”；战备了，那就“深挖洞，广积粮……”；开批判会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粮食不够吃了，想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四．最新指示

“祖国山河红烂漫，神州大地喜讯传”。每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就如喜事天降，举国欢庆。每隔个把月就来一条最新指示，毛主席给工人送芒果，人造卫星上天（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晚，几乎所有国人都走出户外，屋顶上、高坡上，登高仰望星空，寻找那颗高唱东方红的星），氢弹爆炸，都要去游行。学生住在学校附近尚好，可苦了住在四面八方的老师了。

那时要求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而最新指示发表又多在晚上八、九点钟。电波就是命令，无论夜色多晚，天气多冷，人们都要尽快赶到单位或学校集合，高举毛主席画像、语录牌、红旗、横幅，涌向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庆祝一番。刹那间京城的主要街道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好似过节一般，直持续到

午夜。队伍太多，人们是行一停三，最初还能走到天安门，后来只能走到府佑街就根本走不动，学生队伍人小多易被冲散。在中南海西门亲见一人额头被二踢脚蹦出鸡蛋大的青包。次日凌晨，环卫工人能扫出一堆堆被踩掉的鞋子。

参加游行，一路上要高呼革命口号、朗诵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谁领喊、领唱多，那也是衡量一个同学要不要进步的尺子。

五. 政治斗争

刚入学时，学校中院东头有一个大批判专栏，老三届的学生将全校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画在上面，丑化得惟妙惟肖。因为画中有教我们的徐光和张陞两位老师，我印象深刻：徐光肩上搭一条毛巾，推着一辆独轮小斗车。张陞颈扎一条毛巾，掖下夹着个T字板。

罪行较轻的黑六类在革命师生监督下可以带课，罪行较重的尚集中在学习班、正在隔离审查的不能回家，由学生轮流监看。黑六类吃饭时列队到食堂，在毛主席像前90度三鞠躬，口中念念有词“走资派**向毛主席请罪、坏分子**向毛主席请罪”，此后方可用餐。

如果哪个班级批判会需要，随时可以传唤，在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中、群情激昂的声讨中，垂头站立一堂课，虽然此时既要触及灵魂又要触及皮肉的武斗已被禁止，但革命小将情绪高涨时仍有“喷气式”（被批斗者垂头弯腰呈90度以下，两臂向后被群众拧押着），曾见老校长杨滨被老三届拉去批斗，飞机式教育结束后被搯出屋门，她出门后抻衣角，理发丝，正气凛然的神态我们依然清晰可记。

在那丧失人性的年代，并不是每一个受冲击的人能承受得了的，文豪老舍都堕入太平湖，将军罗瑞卿都纵身坠楼，何况平民百姓。我们入学不久，语文女教师刘承秀不堪侮辱，用剪刀生生剪断自己的喉管“自绝于人民”，那是需要何等决心与毅力，在礼堂后夹道墙上道道挣扎血痕，是无言的抗争、无声的控诉。

六. 忆苦思甜

那时的政治活动三大项：政治斗争批判会、学习毛著心得讲用会、忆苦思甜。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仇，
千仇万恨，
千仇万恨涌上我心头。
记得那一年，
北风刺骨寒，
.....

每次忆苦思甜大会要在低沉哽咽的《忆苦歌》中开始，歌毕，由校领导或年级领导动员（视组织规模而定），然后请上活动主角——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或是贫雇农作忆苦报告。

由于有些报告者文化素质低，曾出现“旧社会苦啊，困难三年更是苦啊”的尴尬局面。所以后来单位请报告人，多邀请经过考察者。别看这些演讲者没有文化，大字识不了几个，却都是经过无数场演讲的千锤百炼，无讲稿能讲上一两个小时，声情并茂，收放自如，介绍他们在旧社会具实的或经过加工（那个说违心话的年代，大地主刘文彩都能杜撰出来）的苦难经历。

那时忆苦思甜的老师傅、贫农老大娘演讲是没有分文报酬的，凭的就是个阶级觉悟。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万恶的旧社会”，“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报告不时被口号打断。连指导员丛俭滋振臂高呼的形象恍惚就在昨日。

听忆苦报告时，学生纪律最好管，同学们个个神情肃然，唯恐戴上阶级立场与阶级感情问题的帽子。

报告结束，众人要一起吃忆苦饭，那用麸子、豆渣捏成的小团子直刺咽喉，难以下咽，若一口吃得多点儿就会噎得你俩眼流泪。时过境迁，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西单开了一家“忆苦思甜大杂院”餐厅，菜谱分忆苦篇和思甜篇，小鸡炖蘑菇竟然列入忆苦篇。

七. 珍宝岛事件

中苏关系上世纪60年代初自赫鲁晓夫时代起恶化，直至双方在边界开始发生武装摩擦，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仅0.74平方公里，无人居住，在中苏关系友好时，其主权不是问题，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军开始在这一带制造摩擦。3月2日苏军侵入珍宝岛，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赢得了胜利。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打倒新沙皇》社论。全国各地纷纷集合，抗议苏联军队的武装挑衅，北京市举行了连续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连绵不断的队伍到东直门内苏联大使馆前声讨。其实同样，苏联也组织群众到中国大使馆去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有工人、干部、居民，但主体还是学生。不长的时间里，连续去了三次，每次都是从学校出发徒步前往。游行的队伍太多，前进困难，我们有两次根本到不了大使馆门前，不到东直门就绕回来了。有一次在北海后门就停滞不前，那时的北京很冷，一个冬天要下好几场大雪，每场雪都很厚，那天正值雪后，大家在那里痛痛快快地打了一通雪仗便打道回府。

那时的孩子只会雪仗嬉闹，殊不知当时中苏边境屯兵百万，战争随时可以爆发，那几年中国的备战主要是针对苏修。珍宝岛冲突，使得苏联不敢小觑中国，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其战争企图。1969年9月，在首都机场，周恩来总理同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会晤。其后，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冲突开始和缓。

珍宝岛事件后，英雄孙玉国成了万人瞩目的人物，全国巡回演讲。此后火箭式提升，从连长起，1974年33岁的他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后因与“四人帮”有染，转业当了工人，据说现在经商。

八. 五·二〇声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支持南越政府与北越展开了多年的战争，由于苏联、中国对越共的支持，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1970 年美国把战火扩大到柬埔寨，利用军人郎诺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以前总是对中国不满的西哈努克亲王政治流亡到北京。5 月 20 日毛主席发表反美声明，次日在北京召开群众集会，声援越南、柬埔寨。

21 日早晨，我们很早来到指定地点担任集会的戒严标兵。手持横幅、彩旗、标语的群众队伍连绵不断的涌向天安门广场，至上午 8 点半天安门广场及两侧长安街已是人如潮旗如海，整整五十万人啊，应是北京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会。

那时为了五一、十一游行，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等街道的灯柱上都安装了高音喇叭，在等候大会正式召开前，这些扩音喇叭一遍遍地播放着应时创作的“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的歌曲。这支曲子亦成为此后流行的革命歌曲，曲调至今犹记——

东风吹，
战鼓擂，
究竟世界上谁怕谁，
不是人民怕美帝，
而是美帝怕人民。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毛、林等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在人民大会堂会与西哈努克亲王会谈 1 小时后，10 点钟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大会由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宣布开始，林彪代表毛主席宣读 5.20 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是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基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写得气势磅礴，可林副主席读得时而气若游丝，时而歇斯底里，那人们当时虽有所感却不敢有所言。

声明的发表给了美帝当头一棒，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津巴布韦、刚果（布），阿尔利及亚、南也门等第三世界的穷哥们纷纷发表声明拥护支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电影院里放映的几乎都是中、越、柬、老首脑频频聚会和西哈努克在中国各地访问的记录片，努克成了上镜率最高的男主角，他第六个漂亮的法国妻子莫尼卡成了当时最养眼的女明星，就连摇头不止的宾努亲王都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别看中国当时内乱未止，在第三世界中却很有地位。老挝爱国战线党一个领导人说：“毛主席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一定能取得胜利的”。红色高棉最终掌握了柬埔寨的政权，奉行的政策比中共还“革命”，努克不得不长居北京。

九. 学工

“五七指示”发表后，最初的学工是组织学生到工厂去。我们的第一次学工是到北京照明器材厂劳动。该厂位于护国寺对面的宝禅寺街（现名宝产胡同），是个街道企业，厂房占居的就是寺庙，当时报纸上曾登过一篇报道该厂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庙堂小厂闹革命”。厂子的主要产品是生产一些玻璃艺术灯罩，那时个人家宅没有现代灯饰，这个厂子的产品主要供宾馆饭店和长安街的华灯。当时灯具厂正好有座车间拆建，我们便充当了免费壮工，担土，搬砖。大家最爱抢着干的是小车运渣土，推车飞奔的愉悦不亚于今日飚车的感觉。

后来各中学陆续开办了自己学工基地，叫校办工厂，文革后校办工厂转化为

“三产”。校办工厂规模不大，产品简单，属密集型手工劳动。四中校办工厂的产品是钢丝绳卡子，用来固定各类钢丝绳，男生力气大些，就干用板牙套扣的活，女生力气小就去干电镀的活。车间里的师傅多是有问题被下放的老师，张陞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带领套扣。

为了保证产品生产的连续性，按班级轮流，做到车间常年有廉价劳动力。

十. 学农

1966年5月2日，总后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5月7日，毛泽东就这份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里面有一段话：“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1970年6月学校安排学农到顺义参加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学农要交伙食费和粮票，这对困难家庭来说增加了负担，因为在家一起吃毕竟要省些。但多数同学还特愿意去，那是少年时代第一次出远门去过集体生活啊。在家将被褥打好背包，别上脸盆，带上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个个兴奋不已。

我们那次学农是先坐火车到顺义县城，然后背着行囊徒步走到张镇公社虫王庙大队。初以为是“崇王庙”，近查才知是“虫王庙”。以虫修庙甚为少见，缘明朝某年蝗虫为害，蝗群经过，稼禾无几，村民遂于村西修建虫王庙一座，祈求蝗灾迅平。

酷日当头，田里无遮无挡，一人几垄小麦拔下来，汗流浹背，麦芒沾在手臂上刺痒难忍，一天下来手掌勒出了泡，腰也直不起来。此时最知“粒粒皆辛苦”。休息时渠坡上半卧，喝着绿豆汤，嚼着生麦粒，嗅着泥土香，是另一番的惬意。

男生宿地在小学校，地上铺上干麦秸就是大连铺。二十几人男孩都住在一个屋里，总是要闹点事。一日中午，好恶作剧的几人用红药水、紫药水给熟睡的柯敬贵画了一个大花脸，下午上工，柯排长站在队前一脸严肃地发号施令，男生女生无不捧腹弯腰。程美至老师高度近视，对同学的发笑不解，许久，贴近端详才发现柯脸异常，更是引起同学们大笑。

劳动归来，学校院子里，一人一盆凉水，冲刷一日的泥土和汗水，简直比现在桑拿还爽。

一日中午乌云压空，豆大的雨点骤泻，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去场院苦麦垛去呀”，大家头上顶个草帽就跑了出去，大雨倾盆而下。与天斗，其乐无穷也，等盖好麦垛回来，个个成了落汤鸡，却都兴高采烈。

夜幕降临，同学们坐在门前的土坡上望着星空“卡拉OK”，“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唱累回去睡觉。

一个星期后转到赵全营公社红铜营大队，据说此地乃山西大槐树所迁洪洞后人聚居之所，后洪洞讹读红铜。在这里住老乡家，凡接待学生的农户都腾出一间房，一条炕少则三四个、多则六七个。此地蚊子巨多，每人身上都有不少大包，午睡时间，程老师时拿着一瓶氨水到各居住点给学生涂擦，张健有一包咬在大腿根，不好意思褪裤，程美至言，我小孩都好几岁了，你们跟我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在红铜营的农活主要是夏种，挑秧、抛秧、插秧，下到水稻田里，不一会儿腿上就会吸上蚂蝗，当时并无感觉，上得田埂，便发现每人腿上都有两三条，女生吓得嗷嗷叫，往下揪，越揪越牢。后来老乡告诉我们，使劲拍，它就掉下来了。一试，果然灵验。

学农吃的是大锅饭，窝头、饼子、棒碴粥、熬菜带点肉星，偶尔吃上一顿肉笼或包子就美得不得了。有顿打卤面，那叫一个香，至今未忘。刚到红铜营，住宿还没安排好，大家就在场院吃午饭，临建的灶台，几口磨盘的锅，2尺长的筷子，斗大的箅篱，门板大的案子，甚为壮观，估计都是农村办红白喜事的家什。那里，是第一次见到面条不是擀出来的而是抻出来的。

十一．迎宾

在校期间时时有“迎宾”政治任务，那时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自建国门至钓鱼台国宾馆路两侧，十里长街全是有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队伍，周恩来总理与外宾站在敞篷车上接受欢迎，与当今朝鲜迎宾场面一模一样。

第一次迎宾是苏丹总统尼迈里，提前数小时到达指定现场，等候外宾经过。待车队将到时，听命令挥舞纸花、彩带或两国国旗，有节奏地欢呼“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我们当时是在民族宫前，那是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周恩来。

迎宾任务还有两次安排在天安门金水桥头，迎接的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社会主义兄弟齐奥塞斯库同志后在政变中被杀。塞拉西个子很矮，为了检阅的威仪，据说在检阅车里垫了小凳子。

在金水桥，那可是迎宾队伍的核心，不是一般的方阵，要求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跳迎宾舞，所以在迎宾前还要舞蹈训练。形象好的，跳得好的，长得高的都调到前几排。李维萍跳舞的照片当年曾大幅刊在《人民画报》上。

十二. 劳动节与国庆节

建国以来，天安门广场每年逢“五一”搞焰火晚会，逢“十一”，举行盛大游行庆典。城四区的学校都要承担这些政治任务。

1969年国庆，我们的任务是外围戒严，在北长安街北口担任标兵，夜里九、十点便去上岗，深夜寒冷得都要披上棉大衣。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游行全部结束我们才撤岗。

1970年国庆参加了游行与组字。“亲不亲，阶级分”，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游行队伍的人必须政治可靠。只要出身好，就可以入选民兵方阵。如王建国、孙东玉、柯敬贵、侯梦会等。连指导员丛俭滋家庭出身好，就负责带民兵。

组字方阵在天安门广场，距离天安门城楼比较远，即使发生状况，也不会对中央首长构成威胁，所以家庭出身差些的可以参加组字，如战嘉怡、闪莹、赵萍华等。连长齐大群出身不好就负责带组字队伍。而家庭问题严重的周至同学则只能去劳动，如将粉笔头粉碎做再生粉笔。

懵懂少年无罪无过，却因为家庭，在政治上划出三六九等，对这些同学稚嫩的心灵无疑是一种深深伤害。

参加国庆活动的同学，从暑假前就开始集中，进行训练。然后再经过多次各种规模合练，最后在节前的某一个夜里到天安门广场彩排，甚是辛苦，排练中屡有中暑晕倒者。

民兵方阵就是肩扛“六斤半”半自动步枪，从南池子南口正步走到南河沿南口。组字是每人手持彩色大翻花，根据方阵中旗杆上的信号旗的变化翻出不同的颜色，从高处看数万人的翻花组成巨大的拼图，或图案，或口号，有如现今多媒体的大屏幕。

1971年国庆活动训练突然中止，“十一”的游行庆典活动被临时取消，改为游园。后来才知道，是由于受林彪叛逃事件影响。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取消了这每年一次花费巨大的面子工程。

十三. 战备

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文革开始没多久，为防苏修突然空袭，北方城市开始修挖防空洞，并一直延续了许多年，政府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人民防空指挥部。

早期的防空洞不似后来人防工事那样坚固，街道在院子挖的防空洞完全是菜窖的水平。最初，学校在操场东西北三面挖了一些齐腰深的防空壤，备战未用上，成了男孩捉迷藏的好所。另外当时中院有几栋房子颓败，残垣断壁，也是常玩捉迷藏的地方。

全市都盖防空洞，建材一时紧张，砖头奇缺。学校在操场东南隔建起两座砖窑，就地取材自己脱坯烧砖，女生黄曼文获得脱坯能手称号。后来校办工厂制作了一台简易的制砖机，学生们就不再人工脱坯了。

为盖防空洞，还曾到西直门南侧官园一带拆过城墙砖。古时城砖黏结是用白灰加糯米浆，十分结实，要想拆块整砖十分困难。京城明代城墙就这样一点点消失。

砖供不上，就造干打垒的防空洞，将拌有石灰的三七土灌在模板内一层层夯实。石灰卸在积水潭北太平湖火车站，成百上千的学生们用簸箕、土盆装上白灰，蚂蚁搬家似的将数吨白灰搬运回四中。白灰粉尘落在同学们的身上、脸上，个个像圣诞老人。

十四. 野营拉练

1970年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汇报他们组织战士战备野营拉练的情况，主席11月24日把这个报告批给林彪。“此件可阅，我看很好……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党中央据此发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11.24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

小学生多是象征性地走一走，而中学生则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指示，十五、六的孩子们背着十几斤的行囊一走就是小一个月，真是一次艰苦的磨练。请看“野营拉练战时的编制”——

排长：战嘉怡（负责带队、军训）、李焕平（负责政治思想、兼副连长）、郑倍红（负责宣传鼓动）、时信华（负责生活管理）。

一班长：侯梦会、闪莹；二班长：王伟、刘荔；三班长：董淑敏、田志信；四班长：赵萍华、周至。

连副司务长：柯敬贵；校文艺宣传队：曾桂荣、陈瑞宝、朱荣；连卫生员：于五建；排卫生员：王建国、赵萍华。

1971年2月5日出发，走西城，穿东城，跨朝阳，越昌平，绕怀柔，抵延庆，最后经顺义回到北京，历时25天，3月1日回到北京，行程670公里，每次行军几十里，最多一次100多里，翻山越岭8座，夜行军1次，强行军1次，急行军3次，防空军事演习4次。同学们对此行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累”和“饿”。

累。扎着腰带，擎着旗帜，开始是雄赳赳、气昂昂，可不出几天便都一瘸一拐，没有一个脚上不打泡的。年老体弱的老师和正来状况的女孩子，仍要一样地负重行军，更是苦不堪言。“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与天斗其乐无穷”。一日行军正赶上下雪，起初星星点点，后犹如鹅毛，不多久就白茫茫一片。正午时分走到延庆珍珠泉的山路上，举目望去，群山银装素裹，古长城莽莽巍峨，行军队伍首尾不见，山上山下红旗风卷，歌声口号声此伏彼起，真好似一幅瑰丽画卷，煞是壮观。七排的王寿彝老师站在山崖上，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动情地高声朗诵毛主席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回肠荡气，震撼心魄。

饿。按定量标准交的粮票，伙食自然不能超标，突然大能量的消耗，加上没有一点油水，同学们总觉着吃不饱，特别是男同学，那时男女生之间都不说话，有时哪个女生支援下哪个男生，会成为几天的玩笑话柄。行前，要求每人自带炒面一斤，放在挎包里，曰“战备粮”，规定没有命令谁都不许动。快回来的一个晚上，男生在一个大屋子里，不知谁挑的头，也不知是饿的还是馋的，纷纷拿出炒面动用了不同程度。后来不知是检查发现还是有“叛徒”告密，在全连大会上将吃光炒面的同学叫到队伍前示众。

拉练都是住在老乡家，学校要求和解放军一样，做到缸满院净，不管多累，放下背包拿起笤帚就去清扫庭院，抄起扁担就去挑水。那时北京的地下水位很高，有的地方根本不用轱辘，直接用扁担就可以打上水来。

【三不准】

- 1、不准私自到供销社或自由市场买东西。
- 2、不准滑冰或其他危险的事情。
- 3、不准擅自离开住处，任意行动。

【四不离】

- 1、虚心接受再教育，未征求意见不离村。
- 2、发生问题，未做彻底解决不离村。
- 3、未做好“借还损赔”不离村。
- 4、未做好“一满三净（缸满，屋、院、街净）”不离村。

【五要五不要】

- 1、要努力学习，执行宣传毛主席“11.24”批示，大谈野营收获。不讲不突出政治的话。
- 2、要挤时间空隙，组织学习，不闲逛，不乱串门。
- 3、要见缝插针做好事，无故白天不躺炕。
- 4、要提高警惕，时时刻刻不要松懈战斗意志，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
- 5、要爱护群众，守纪律，不挑逗一切牲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

拉练曾在鲁町、聂山东营、沙峪口、孟庄、渤海所、洞台、杏树台、九渡河、孙史山、石家营 10 个村庄宿营过。其中渤海所、洞台、杏树台、九度河等地现在已开发为旅游景点。渤海所是个古乡镇，建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城墙均系石头所建，至今保存完好，很有特点。杏树台村明初成村，果树成林，旧时村庙台上有 2 株杏树而得村名，现已成为农家乐度假村。

驻扎下来就不能吃大锅饭了，各个宿营点从连里领来粮食、蔬菜自己做，男

生赶上和女生住一个院还好些，可以借光。若是几个毛头小子独住一处就只有求助房东帮助贴饼子了（自己做往往是凉锅贴饼子一溜了）。菜，多就是盐水煮白菜。做饭家伙不够脸盆凑，可这脸盆是一盆多用啊，又洗脸，又泡脚，甚至夜里还当过尿盆。

那时的冬天真是冷，有些坏小子，起夜怕冷，曾干出把窗户纸捅破往外撒尿的事。在一地较长时间宿营，夜里还要安排站岗放夜哨，北风呼啸，月光惨淡，半夜三更出来，院子里的棺材影影绰绰，冷不丁的几声狗吠，令人毛骨悚然。

宿营期间还组织过夜间紧急集合，有的同学怕应措不及，晚上先把背包打好，和衣而睡，一连着好几个晚上，终于等到了紧急集合演习，嘈杂的脚步声、紧张的喘息声、低抑的口令声，既紧张又神秘。夜色中排好队列，匆匆出村，在野外跑上一大圈再回来睡觉。

宿营休整间还要请老战士、老贫农做忆苦思甜报告，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学生住宿一般要安排在生活条件好的农户，有一次实在安排不开了，曾住进了一家五保户，一对老夫妇孤苦伶仃，那个日子过得惨，如果拍电影找旧社会穷苦农民的外景地不用另外布景。

十五. 军训

1971年10月7日全连九个排来到北京卫戍区黄村农场学军。军训的历史比拉练早几年，毛泽东也有过批示。“五七指示”发表后，驻京部队拿二中和25中为试点，对两校师生进行军训。毛主席得知后批示全国学习贯彻。

此次大兴黄村之行，名曰学军，除了队列练习和一次打靶外，余下时间全是割稻子。

生活实行了军事化管理，5：20起床、5：50-6：30早操练、6：30-6：55洗漱整理内务、7：00-7：30天天听、7：30-8：00早饭、8：00-9：00天天读、9：00-12：00劳动、12：00-12：30午饭、1：00-6：00劳动、6：00-6：30晚饭、6：30-7：00休息、7：00-8：30晚点名日总结、8：30-9：00洗漱、9：00熄灯。

在家谁五点多就起床？顶着星星出操，迎着朝霞回营。秋风乍寒，个个冻得

小脸通红。

那时北京的蔬菜单调，一个月就是白菜、萝卜、土豆来回转。吃的菜总是油汪汪的，但不香，后来知道了菜炒好后，再浇一点明油就这样了。

上工时，学生与战士混编，一人几垄比着干。年龄比他们小，镰刀比人家的差，埋头弯腰的干上一天，累得啊，上厕所都蹲不下去。

几个排的上百男生住进一个礼堂，累了一天，睡在稻草地铺上也很香。一天劳动时刘书云捉了一只小松鼠，他在枕边用砖头搭了一个窝，每天喂它，几天后出工回来，发现小松鼠只剩了骨骸，凶手是入侵的地鼠。

当时在军营，向战士们学习了两首军歌，几乎天天卯着劲喊唱。

“我们年轻力壮，来自四百八方，我们亲如兄弟，共有一个思想，军旗在头上飘扬，誓言牢记在心上，我们安心服兵役，共同守边疆，保卫祖国飞跃成长，祖国处处放红光，哎嘿，士兵的荣誉是最高的奖赏，毛泽东的战士无尚荣光”。

“唱的是毛主席的语录歌，读的是毛主席的宝书，想的是毛主席的教导，走的是毛主席开辟的道路，跟着毛主席一辈子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工余时间为了消遣，不少同学向战士们学习用稻草扎扫炕笤帚、坐垫、坐墩等。临行前，工宣队要求不拿农场一苗一草，结果大家的手工艺品全都丢在稻草堆里。

十六. 家庭学习小组

虽然是复课闹革命了，在老三届尚未离校时和教师有运动时，同学只能半日到校上课或活动，于是学校组织了家庭学习小组，将就近几个同学按学习成绩、男女生搭配组合起来，到家居稍微宽裕一点的同学家里一起做作业。寒暑假也这样组织。

在那个个人崇拜巅峰的岁月，无论是田间地头、车间，还是礼堂、会议室、办公室，以至家庭都要在显赫位置悬挂或张贴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有歌为证：“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

小组学习，几个同学到齐后，同在学校一样，要起立面对毛主席像共祝“毛

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坐定后也要先翻开红宝书读上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开始写作业。

那时孩子们男女有别，虽然同在一组，甚至一桌学习，只有需要时几句简短“工作”性对话，其他概不相言。

十七. 课外体娱

扭曲的年代，孩子也被政治化，失去应有的童趣，课外体娱单调得不能再单调了，扑克、象棋都是封资修，烧掉没商量。没有电视，谁家里有个收音机听听《欧阳海之歌》就很不错。图书馆关闭了，新华书店卖的全是时事政治书籍。

电影院基本闲着，即使放映，当是当时的一些时事政治纪录片。故事片就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俄国革命遇到了困难，列宁卫士瓦西里望着饥饿的孩子对妻子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这句话很快成了当时的流行语。后来又陆续解禁了军事教育片《地道战》和《地雷战》，“杀回高家庄”、“二曼接枪”亦流行。

没办法，学生们因陋就简，自寻快乐。女孩子常玩的揣拐（拐：羊或猪的膝关节）、跳皮筋、跳房子、拽包、玻璃丝编织。男孩子则利用破椅子腿和操场边的防空壕玩打仗，或是用烟盒或废纸叠个三角、元宝拍着玩，或是地上挖上5个坑（胡同里全是土路）弹玻璃球，夏天用猴皮筋熬成胶粘知了，满街捡冰棒棍玩撒棍，秋天捡杨树落叶拔老根，或是在地上画个方块，用小板凳打乒乓球。下午放学后，能在小操场占个水泥台子打上一会乒乓球，那就是高档娱乐了。

有文艺特长的同学可以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曾桂荣歌唱得好，陈瑞宝快板打得好。记得八排汪玉华学唱《沙家浜》中郭建光登上大操场的舞台。

十八. 政治生活

那时班级均以军事序列，连相当于年级，排相当于班，班相当于组。毕业前班里的干部是：战嘉怡（排长）、柯敬贵（副排长）、时信华（副排长）。侯梦会（一班长）、闪莹（一班副）、王伟（二班长）、乙淑琴（二班副）、曾桂荣（三班

长)、田志信(三班副)、赵萍华(四班长)、周至(四班副)。

文革以前的优秀学生叫“三好学生”，文革改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战士”。

当时党团建制全部瘫痪，红卫兵成为中学统一的基层政治组织，李焕平、柯敬贵、张愿平、刘剑兵(在10排)第一批加入红卫兵。李焕平曾任红卫兵副连长(相当年级团总支副书记)、刘剑兵(先)柯敬贵(后)是红卫兵排长(相当班里的团支书)，毕业前全排共发展红卫兵25人。毕业前半年恢复了团组织，与红卫兵组织交叉存在，李焕平、柯敬贵为在校入团仅有的两名团员。

附：毕业前红卫兵名单

战嘉怡、柯敬贵、李焕平、郑倍红、时信华、侯梦会、闪莹、王伟、刘荔、董淑敏、田志信、赵萍华、曾挂荣、朱荣、孙东玉、于五建、史玉刚、乙淑琴、王向红、李维萍、张健、黄曼文、袁淑芬、张春英、陈志刚。

十九. 物质生活

经历了三年灾害后，国家经济刚有好转，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人们的生活水平又徘徊在贫困线上。

几乎所有的食品、生活用品全部凭票证定量供给。一个月粮食定量男生是28斤，女生26斤。粮食中面粉不及1/4，余下的是棒子面和大米。面粉是黑面，也就是含麸的全麦粉，吃起来比较糙，富强粉只有春节才配给一两斤。现在的全麦粉营养成分全面，价格高出富强粉不少。大米全是粳米，也就是糙米，好米也是要到过年才给一点。每人每月油半斤，肉半斤，粉丝二两，麻酱一两；每户每月糖一斤，鸡蛋二斤，豆腐二斤。冬天要排几天几夜的队储存大白菜和白薯。当时挂面卧鸡蛋、馒头蘸麻酱白糖，那是病号饭。

穿衣盖被要布票、棉花票，缝衣服的线每月只限几支，买肥皂、香皂、洗衣粉要工业票，火柴都要定量供应。谁家生了小孩，才给2斤红糖。牛奶只供应婴儿和60岁以上老人。谁家有台缝纫机、自行车，那可都是高档家居品。

那时未实行计划生育，大多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衣服、鞋子都是上边大的穿完，下边小的再接着，多是补丁摺补丁，小女孩有一分钱一根的玻璃丝扎小辫，

那已经是很奢侈了。

毛线是高档品，大多数家庭冬日都是棉衣、棉裤、棉帽、大棉鞋。要过年了，买不了新衣，就花几分钱买一袋染料把衣裤染一染，见见新。

一分一块的水果糖、2分钱一个的米花糖、3分钱一根的冰棍都让孩子们馋涎欲滴。

就是这样艰苦的日子，亚洲四小龙都在腾飞了，我们还被要求牢记世界上还有2/3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要想着解救苦难的台湾同胞。

二十、毕业分配

由于文革的特殊历史原因，学生自己决定不了自己的前途与命运。老三届（66、67、68）全部到山西陕西等地农村插队去了。“新三届”中的69届学生全部发到内蒙古和东北建设兵团。

由于文革，国有企业也好几年没有招工了，70届全部留在城里分配在各大工厂。到了71届，毕业去向就比较杂了，有好有坏，大大增加了分配难度。

从大兴部队农场回到城里后，经过一两周传达林彪叛逃事件，短暂的批判林彪叛党叛国后，即刻开始了毕业分配动员工作。

在这时批林的运动中尚未深入，其“512工程”等具体批判材料尚未整理出来，批判起来比较空洞，多是跟形势表态。有个老师控诉林彪罪行，“林立果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在校时上学来放学走，看来那时他是披着假装老实的外衣，掩盖策划反革命活动的真实面目”。可就在上个月，他还在讲“林副统帅的儿子是我们的校友，在校读书，从来是自己来自己走，从不张扬，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学校有个工友在广播批判会上义愤填膺，“我叫张树林，为了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我从今天起改名张批林”。唉，人人言不由衷。

毕业分配的去向有留校、上高中、国有企事业单位、街道集体所有企业和插队。

在毕业分配前一年，刘剑兵、张愿平、陈述系军人子弟内招入伍走了。

学校留下李焕平做团的工作，时信华教体育，柯敬贵做司机（那时的司机是上好职业，有听诊器、方向盘之说），曾桂荣凭借特长教音乐。

从71届开始有限度的恢复高中，九个初中毕业班拼出一个高中班，每个班只出几人。选拔上高中的首要条件是出身要好，当时董淑敏、王向红、朱荣几人享此幸运。谁知74年高中学完又赶上反右倾风，唯恐培养出修正主义苗子，所有高中生全部插队。当然1977年恢复高考，这些人多数考入大学。

其他出身好些的同学分配到国有全民企事业单位，侯梦会、王建国、孙东玉、高慧兰分在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柳克均、郑贝红分在北京市医药公司，田志信分在首钢，冯存华分在北京二汽，成广盛、于五建、张亚丽、邢桂兰分在化工五厂。

出身差些的多分在了街道集体所有企业，赵萍华、乙淑琴分在西城风机厂。

分配完了，班里就剩了战嘉怡、李正基、周至等所谓家庭有问题的同学。赵光明虽出身好，但品行不端，亦在插队之列。全连将各排所剩集中成一个排。1972年1月北京市药品检验所又来要学生，战嘉怡和六排的霍凤英、七排的袁鹰、八排的杨祖芬、三排的李秀萍搭上意想不到的末班车。剩下分配无望的同学几个月后插队到了昌平。

1971年底，这些相识相处三年的男孩女孩们便开始了各自的人生。

【述往】

往事四十年

——北京四中 71 届 3 连 4 排

侯梦会

1968 年秋，14 岁的我第一次走进了北京四中的大门。他给我第一印象是：校园真大呀。拥有四百米跑道的操场长满了半人高的绿草，操场西侧黄土堆起小山一般的土丘。令我一个在南城四合院校园里上过小学的孩子感到极大震撼。

从那时开始至今屈指算来已经整整 40 年了。想当年读毛泽东词：“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时曾感叹毛泽东对往事追忆的大气和潇洒。如今我们也有了回忆 40 年前往事的资格，对青少年时代的珍惜，对母校的眷恋，对同学情谊的追忆，对少不更事所犯错误的羞涩。一起涌上心头。正所谓：岁月逐波，往事如歌。

战嘉怡同学积极倡议，张春英、李正基同学辛勤联络，众多同学纷纷响应。今年我们 71 届 3 连 4 排的同学要大聚会。受战嘉怡同学之命，将记忆里的中学生生活片段，整理了一下形成此文。与全班同学共忆花季年华。

那个年代正处于文革期间，学工、学农、学军各种政治活动成了我们中学时代主要内容，而文化课却成了点缀。因此点滴记忆却弥足珍贵。

记忆中的老师：班主任：李之绥、李振波、程美至。

物理老师张陞高高的个子，讲左右手定则时，教我们怎样记牢，又如何区分时在黑板上写下（马发）这个怪字，然后讲解道：马代表马达（电动机），用左手定则，发代表发电机用右手定则，所以马在左发在右。

化学老师徐光当年教我们怎样用嗅觉分别瓶中不明液体，左手拿住已经打开的瓶子，右手在瓶口轻轻向上煽动，然后用鼻子轻轻吸。在试验时有同学不以为然，打开瓶子猛吸一下，当时就呛得眼泪直流，原来那是氨水。张、徐两位老师的教导，我在工作中经常想起。

李振波是教政治的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当时很年轻，还没有结婚。人很好，就是有点邋遢，当时很多同学都以此和他开玩笑，我就填过三首《十六字

令》，嘲弄过李老师，时隔几十年，依然有同学记得此事。现在只记得一首：“脏，几个月不洗衣裳。仔细看，虱子排成行。”

程美至是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高度近视，当时也很年轻，很有激情，经常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当时搞教育革命，程老师讲课时说只要同学已经掌握授课内容后，就可以看课外书，我就是在上语文课时把《红楼梦》读完的。我爱看书，当时讲关心政治，读马列原著。程老师帮我借了很多书，像中苏争论时的《九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等。使我受益匪浅。记得共产党宣言开头第一段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最后一句是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几十年后我在一家私企打工，老板也是同龄人，私交很好，年轻时也曾读过共产党宣言，开年会时非要我出一个宣传共产党宣言的节目，为了保住饭碗，多拿奖金我只好从命。当昆仑饭店宴会大厅响起“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引起了资本家老板、几百名私企员工和来宾中政府官员的热烈鼓掌和笑声。

英语张老师，是个老太太，非常和蔼，头上有个包，为此同学就嘲弄老师。可惜那个年代，那个年龄，动荡的时代，少不更事，只学了一些像 long life chairman--mao, workers, peasant 等的句子和单词，很快又还给老师了。

有个代课的语文老师，是个老先生，忘记姓什么了，但是讲鲁迅的《友邦惊诧论》，诵读时略带口音，抑扬顿挫，“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时的情景和声音，几十年却清晰留在记忆中，真是大家风范。

语文课本曾有一篇老舍先生关于养花的文章，当时是作为大批判对象用的，2000年我带女儿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时，遇见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副馆长，陪同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陈广文参观，交谈时谈到老舍先生的文章，我说第一次读老舍先生的文章就是文革中的语文课本并且是被批判对象时，大家感慨不已，这是后话了。

数学课老师张智慧，是个中年女老师，带个眼镜，和程美至老师关系很好，是3连5排的班主任。

记得有一次上历史课，老师在黑板上写炎帝、黄帝时，有同学就提出老师写

了错别字，应该是“皇帝”。老师很无奈地说：“同学，你们要好好学习呀。”

生物课（当时好像叫农业生产知识）老师姓佟，矮矮的个子。植物的光和作用产生叶绿素，化肥分氮、磷、钾这些常识，都得益于佟老师的教诲。

体育课记得有叶老师，白白胖胖的好像是广东人。还有韩老师，他的嗓门真大，全校在操场开会不用扩音器，他喊的口令非常清晰。体育老师们还有一手绝活，一把铁锹铲上白灰撒出的线条笔直，划出的圆圈就像用圆规画的一样。

还有两个辅导员一个叫洪林（68届老高一），一个叫吴仁侃（67届老高二）。

洪林好像是高干出身，说话比较冲。记得第一次到四中对面的13宿舍（现在的北大医院的位置）开大会，面对小桥、假山景象我不禁说到真像别野呀，正巧让洪林听到，他讽刺我：都中学生了，那叫别墅，不叫别野。从此我就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字。真可谓一字之师。不过他也有露怯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别人说起父母受审查时讲：“我‘考娥’的事没解决，我很烦恼”。战嘉怡同学经过考证，已经去世的父母才称考妣，为此我们大大地嘲讽了洪林一次。

吴仁侃白白胖胖的，好像“出身不好”，不像洪林那样张扬，随和像个大哥。知识面很宽，和他交往我受益匪浅。

当时搞所谓的教育革命，小将上讲台，同学自己教自己。我就讲过一堂语文课，课文是介绍南京长江大桥。多年后，我和爱人新婚蜜月旅行，漫步在南京长江大桥时还提及此事。

王伟同学讲过一次数学课，为了掌握时间，特意借了块手表戴上，当时同学们都很革命，提出带手表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为此给王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中学毕业分手后，有的同学还经常联系，有的同学却几十年没有再见面。然而一想起同学个性鲜明的外号，一张张稚嫩的面容依然清晰生动。

没有考证过给人取外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人发明的，根据我们班同学的外号大致分为谐音、同音异义、姓氏、外形，等等，贬义的居多。比如侯梦会——猴，于五健——鱼头，柯敬贵——磕鸡蛋，田志信——田猪，史毓刚——屎盆儿，柳克钧——柳条，这些都是姓氏谐音型的。记得我曾经仿照小学课文“柳条青，柳条弯，柳条垂在小河边。折枝柳条做柳哨，吹只小曲唱春天”给柳克钧同学编过一段顺口溜：“柳条儿青，柳条儿弯，柳克军来到小河边。手扶柳树高声叫，我是柳条创始人。”战嘉怡同学给此配过一幅漫画。我还曾仿照曲波《林

海雪原》中少剑波描写自茹的一段诗“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体灵比鸟鸟亦笨，歌声赛琴琴声哑”给回志信同学编过一段顺口溜：“万家圈中一小猪，颜似地皮出一家。体笨比象象亦灵，吭声赛娃娃声哑。”还记得和战嘉怡合作，仿照《西游记》给柯金贵编过一段连环画，后被工宣队没收，被批为宣传帝王将相。战嘉怡——驴，李正基——鸡，成广盛——广梨，就是谐音和同音异义型的。周至——京自梨，王伟——书子，王可——缩脖坛子，刘剑兵——猩猩，王建国——富农，恐怕就和形象和动作有关了。孙东玉——大屁，刘书云——小臭，冯存华——老黑，钮钧华——大华，陈瑞宝——大宝，路纯海——路三、小二十，赵光明——小猫子，等等，就无从考证了。那个年代男女界限分明，所以女同学的外号就记不清了。只记得王向红——小豆，李维萍——大苹果，曾桂荣——黑人。那时可以公开读的文学书籍少得可怜，大多数文学书籍都被打上了封、资、修的标记，而我们又处于求知欲极强的年龄，因此只要一个人得到一本书，很多同学都争相借阅，记得一套120回版本的水浒传，就在男生中传阅，李正基同学还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单八将的座次绰号都抄了下来。

那时精力旺盛，又没有正经课要上。男生们经常在一起玩打仗，手中挥舞棍棒把自己想象成古时的战将，捉对厮杀。我曾双手挥舞两条桌子腿儿，号称是牛呆，拨打雕翎，击打躲闪同学砍过来的石块。没想到成广盛同学轰鸽子练就了砍石头的本领，砍得是又快又准。我就被击中头部翻身落马，还好伤口不大没有留下伤疤。有一次已经是晚上，天都黑了，我们还在操场上追打，史毓刚同学的父亲找到学校，一把拉住史毓刚说：早晨7点多就出家门晚上8点了还不回家，这学咱不上了。

钮钧华、于五健同学的弹弓打得非常准，那时都没有保护动物的意识，许多鸟就丧命于他们手中。陈瑞宝同学热爱文艺，是校宣传队的，记得学军时和他一块编过快板并由他表演。田志信同学爱打乒乓球，有一个大刀拍子（横握球拍）。

我们的中学时代被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痕迹，既有少年特有的朝气和躁动，又有因涉世未深对周边事物的困惑和迷茫。同学和同学之间，老师和同学之间，在那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可能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和误会，随着岁月的流逝，相信大家会一笑了之。正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评论】

历史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关于北京四中文革的种种说法

贾 明

历史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被栽赃在胡适头上的“经典语言”，虽然已澄清胡适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但这句话的“事理”却是存在的：历史就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文革结束时，1978年12月28日，在北京四中全校落实政策大会上，当事人——四中领导副书记燕纯义宣读了一份材料：在文革这场历史灾难中，在四中教工159人之中，有45人受到冲击和审查，18人进了劳改队，16人被抄家，25人遭殴打，4人被迫害致死（加上文革后期“一打三反”致死1人，实为5人）。很多人受到肉体摧残，人身侮辱，精神打击。

几个数据，坐实了四中文革的丑恶历史。

然而，时过33年之后，另一个四中文革的当事人——四中文革初期革委会副主任、四中红卫兵头头之一，也是西纠头头之一××，在2011年6月30日出版的网刊《记忆》72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二）”著文《四中与乌托邦》中说：“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语出惊人！

一番言语，重写了四中文革史——四中文革这个丑恶的老太婆变成了俊俏的小姑娘。

历史是不可能复原的，也不可能再现的。历史都是后人对过去的表述。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历史的真实。所以，历史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看是什么人怎么打扮她了。

不时可以见到一些当年四中文革的风云人物发表的回忆文章，其中许多文章有一个共同论点：笼统地说到文革，用的是批判的语言，具体地说到四中文革，则表述的是保护和赞美的心意——其实不妨直白为“四中特殊论”。四中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当时在四中掌权的革委会成员、红卫兵头头这些高干子弟“掌握政策水平高”。

你看，四中没有打死人吧！有人还“引用了”女附中人的话说：我们当时要

是有四中这样的领导，就不会有卞仲耘事件了。把四中抬到至高。

四中也有劳改队，但那是为保护牛鬼蛇神而建立的。主宰劳改队命运的主管，便是“劳改队的保护神”。要不是有四中劳改队，说不定就得出出现四中的卞仲耘。

即使在四中也打死过人，但被打死的人不是四中的。

看来，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惊涛骇浪中，能活在四中真是幸运。那些死在四中的人，也得算是幸运的，因为没有被活活打死。

四中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记忆》2010年6月30日第11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一）”载有刘东《我亲历的四中文革》一文。刘东是文革初期四中革委会委员、红卫兵头头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被当时学校的领导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指定为劳改队的负责人”，是“主宰‘牛鬼蛇神’命运的头儿”，“除劳改队外，还奉命管理全校教职员工。”

他在文中说：

（1966年四中“八四武斗”——作者）“……少数人（太谦虚了，实际是多数人——作者）的拳脚像雨点般地落在被斗者的身上，……很快地，杨滨的花白头发散乱了，鞋子也掉了，脸上的血水夹着汗水裹着泪水洒落在古老的四中土地上。这场闹剧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才在胜利的欢笑中收场。”

“我想经历过这一幕的四中师生们，只要良知未泯，是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场面的。它是四中的耻辱。”

（在劳改队里——作者）“红卫兵小将们用手中的皮带说话。对抓到的人，一般的打骂已不解气，剃阴阳头，唱认罪歌，戴高帽，……他们把打人当成一种乐趣，根本不问青红皂白。”

（关押劳改队的——作者）“小食堂原来只是狭窄、阴暗，后来又加上阴森恐怖，墙上不知是谁用人血写上了‘红色恐怖万岁！’那字血淋淋的，令人不寒而栗。”

（劳改队里的人——作者）“不分年龄大小，不管身体好坏，每天都要光着头，戴着牌子，挥汗如雨，在钳工台上干着重体力的劳动。这还不算，每天出工前，下工后，还要列队低头弯腰向毛主席请罪，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高声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心灵上的摧残大大超

过体力上的劳累。”

“政治斗争把一个个原本善良的人变得冷血，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这是不是“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的含义？

如果再看看王行国的《牛棚生涯》、《北京四中“劳改队”日记》（载2011年6月30日《记忆》72期“北京四中文革专辑二”），这种“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都基本上没有挨过打”的含义，就更清晰了！

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

当年那些风云一时的当权者像刘东这样纪实的，太凤毛麟角了。即使这样，他们笔下的四中文革历史，也是躲不开他们特定历史地位（还不要说当今认识的局限。

【资料】

最高指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中学新生通知书

_____ 同学：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根据市革委会文教组规定的“分区划片，就近入学、统一安排”的招生原则，你分配到我校学习。四中军训团、革委会、红卫兵、革命师生热烈欢迎你们。

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祖国山河一片红，胜利喜报频频传。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导下，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的阶段。目前，四中广大革命师生，满怀无比喜悦、激动的心情迎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正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认真搞好斗、批、改”。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你们进入四中，将壮大革命的队伍，增添革命的新生力量。我们将并肩战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将四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四中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校决定九月二十五日新生入学报到。要求你在入学报到前，做好下面几件事：

1、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语录随身带。特别是学好 8.25 发表的最新指示和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并写出学习心得。

2、报到前坚持到原小学参加学习班。学习班结束时，写学习班学习小结，并要求有小组评议和辅导老师签字。

3、积极参加原小学、街道的大批判和其他政治活动。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半到四中报到，报到需带：

①上面要求你写的学习毛主席指示心得，暑期学习班小结。

②此中学入学通知书和填好的学生情况登记表。

③学杂费五元和本人一寸照片两张。

新生必须按上述规定报到入学。

北京四中革命委员会

1968. 9. 13

（袁淑芬提供）

【资料】

北京四中三连四排班级大事记（1968—1971）

1968年10月底入学，队列练习，班主任李之绥，辅导员吴仁侃、洪林，全连军宣队代表谭班长，工宣队代表袁师傅。

1968.11.18 庆祝八届12中全会公报发表。

1968.11.19 革委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刘少奇的决定，全校开展大批判运动2周。

1968.11.22 全连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

1968.12.6 诉苦三查阶级教育运动，吃忆苦饭。

1968.12.12 深揭深批运动一周，批判一号走资派杨滨、二号走资派刘铁岭。

1968.12.14 发展第一批红卫兵：李焕平、柯敬贵、张愿平、刘剑兵。

1968.12.27 庆祝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游行。

1969.1.10 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9.1.14 开始文化课学习。

1969.1.30 全校第二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9.2 李振波任班主任，三连四连合并，十排解散，学生分插到一至九排，刘剑兵、周至、冯存华等到四排。

1969.4.1 庆祝九大召开游行与大会。

1969.5.1 北海游园活动。

1969.10.1 国庆，北长安街担任戒严标兵。

1969.11 程美至接任班主任。

1970.5.1 参加天安门庆祝晚会。

1970.5.21 五·二〇声明大会府右街标兵。

1970.6 顺义虫王庙、红铜营加三夏劳动20天。

1970.7 民族宫前参加迎宾活动，欢迎苏丹总统尼迈里。

1970.9 国庆天安门组字活动与游行民兵方阵练习30天。

1970.10 战备施工和学工劳动2周。

1970.12.15 拒腐蚀永不沾运动一周。

1971. 2. 5-3. 1 野营拉练一个月。
1971. 3. 29 红卫兵反骄破满整风运动一周。
1971. 4. 19 发展第一批团员：李焕平、柯敬贵。
1971. 5. 21 战备劳动一周，挖防空洞。
1971. 6. 1 天安门金水桥民族舞迎宾，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1971. 7. 24 卢沟桥短途拉练。
1971. 9 国庆天安门组字活动与游行民兵方阵练习 30 天，后取消。
1971. 10. 6 天安门金水桥民族舞迎宾，欢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1971. 10. 7-30 北京卫戍区黄村农场学军。
1971. 11 传达林彪叛逃事件，开展批林运动 10 天。
1971. 11 分配动员 2 周。24 日第一批同学毕业分配。毕业前红卫兵 25 人。

【资料】

北京四中文革大事记

王行国整理

1966年

5月16日 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及以后的一系列社论，始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1967年后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延续至今。）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毛泽东批准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北京大学领导陆平等人的大字报。

6月2日 《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月3日 四中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矛头指向学校当权派和四清工作队。

6月4日 共青团中央派遣的工作组进驻四中。

6月7日 四中工作组作报告，提出要揪出黑人，也要肃清影响，“有账必清，早清早轻”。

6月10日 四中高三五班学生撰写题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倡议书，呼吁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6月11日 四中高三五班学生为此给毛泽东写信，委托四中学生刘源源（刘少奇之子，后改名刘源）将倡议和信呈交毛泽东。

6月13日 工作组宣布行使四中一切党政权力。

6月15日 四中批斗前四清工作队队委，现任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杨滨。杨滨在检查中提出，四清运动中没抓敌我矛盾，对“思想反动和问题严重的人”没有批判斗争，并点了一些教师人名。杨滨给这些人定性后，即出现了围攻这些人的大字报。大字报设“点将台”点了十几个教师的名。

6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以及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给毛泽东的信、北京四中师生的倡议书和高三五班学生给毛泽东的信。当天，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学生到四中表示祝贺和

支持。

6月19日 四中师生在工作组带领下去天安门游行，表示拥护中央决定。

6月22日 四中工作组作报告，提出不仅要把黑帮、黑线揪出来，也要抓“黑点、黑影”；让教师群众人人“引火烧身”。随后，群众互相揭发，抛档案，无限上纲是两大“亮色”。

6月26日 四中组织教师下乡劳动。

四中政工干部、人事干部 zry、jcr、zzh、ycy 等4人贴出《四家店是怎样包庇十六个大坏蛋的》大字报，点名的16个“大坏蛋”是：白杰、马云凤、张禹先、萧立岩、郭玉如、张陞、张育达、黎靖、王钊、徐健竹、王行国、王鑫章、谢健、汪含英、史会仁、黄庆发。“四家店”是四中当权派中的4人：校长、书记杨滨，副书记刘铁岭，副校长、支委俞汝霖，副教导主任、支委屈大同。大字报引领群众批斗方向。

6月28日 四中工作组和革委会派出“学生代表”到各教研组监督教师。规定，组里一切活动要通过“学生代表”。

7月3日前后 四中学生纷纷组织教师进行各种形式劳动，包括到街道住户家掏粪。

7月11日前后 四中工作组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阴亚东、章启明、顾德希、李颐扬等人，打成“九人反党集团”，组织群众围攻，在全校掀起批判高潮。

7月15日 四中工作组作报告，提出要“清理教师队伍面貌”，要求教师互相揭发，再次掀起群众斗群众高潮。全校教师几乎人人都被贴了大字报，一半以上的人名被打了×。

7月18日 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此后多次讲话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

7月28日 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学）。四中工作组撤出。（红卫兵）革委会宣布领导学校运动。

7月30日 四中全校辩论“对联”大会。对联宣扬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8月1日 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

8月2日 四中理化组6人贴大字报，点名要求把十几个“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不这样不足以平民愤”。

8月4日 在四中校园发生大规模游斗、殴打学校领导、教师的事件，全校23人被游校、挨打、侮辱，占教师总人数的近四分之一。游斗后，（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在全校广播，赞赏同学们的革命激情“好得很”，同时让被游斗的人逐个表态“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并在全校广播。从此校内打人之风风起云涌。随即，（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其中大部分人集中看管，劳动改造，被称为“劳改队”。前后被打入劳改队的四中领导和教师有：杨滨、刘铁岭、屈大同、俞汝霖、徐健竹、王钊、黄庆发、张陞、周春芳、王行国、史会仁、廖锡瑞、王希哲、张佐参、张育达、郭玉如（按原始顺序排列），以及曹家骏、王鑫章。学生有：任正吉、韩保安、赵恩平、苏秉初、康铁铸。此外，“八四武斗”乱裹进来被游街，随后又被释放的有：赵如云、栾玉洁、王修言、姜春荣、孟吉平、石磊、禹启中。

8月8日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大会印发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8月12日 四中劳改队被迫唱《牛鬼蛇神嚎丧歌》。革委会宣布，剥夺“牛鬼蛇神”的公民选举权。

8月18日 北京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红卫兵和群众代表，检阅百万群众。四中（红卫兵）革委会负责人和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和部分学生在广场参加大会。

818大会后，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

8月19日 北京四中、六中、八中3校红卫兵和革委会，与共青团新北京市委、北京市教育局共同组织，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批判斗争“黑帮分子”张文松（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部长）大会。北京市教育局、团市委和3所中学的领导陪斗。批斗大会过程中，红卫兵毒打被批斗者。教育局长被打断3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面目全非。

8月20日 北京二中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得到中央支持，23日传媒报道并赞赏。运动很快发展成抄家、打人的暴力行为，形成红色恐怖。四中红卫兵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破四旧活动，将一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市民押送到四中，四中原教工食堂成为拷打和关押这些人的场所。

8月22日 四中给部分“牛鬼蛇神”剃阴阳头、光头。

四中“牛鬼蛇神”被勒令为“西纠”清扫机关（西城报子胡同）。

8月24日 四中“红卫兵总部肃反委员会”打死从校外抓来的两名“牛鬼蛇神”。

8月25日 四中、八中等31所学校的红卫兵组成“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四中红卫兵的领导遂成为西纠的负责人。

8月29日 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第4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限期（于9月10日前）离开北京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这个“通令”四处张贴，北京城里有近10万人口被驱逐到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1.6%。这些人有的在火车上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且作为“阶级敌人”遭到批斗，很快死去。四中教导处职员田钟岳被遣返回乡，原籍无家，当地拒收，再返京被断绝粮食供应，被迫自杀。

10月6日 四中地理教师汪含英、数学教师苏亭午夫妻，被抄家封门，逃到东北投奔儿子，儿子亦被揪斗，二人被迫在香山服毒自杀。

10月 中央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四中学生纷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受到批判。

12月16日 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参加。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其中四中“东方红公社”的两位代表分别做题为《宣判反动“对联”的死刑》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纠察队》的发言。江青讲话，指责西纠把矛头指向群众，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四中举行批判西纠及其负责人的群众大会。

1967年

1月8日 四中牟志京等学生出版《中学文革报》，刊登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该报至同年4月1日终刊，共出版6期及1期专刊。

2月11日 四中全校教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四中教师中的大部分群众组织组成以阴亚东为代表的“革命造

反联合阵线”。

2月23日 四中学生出版报纸《只把春来报》，发表批判“血统论”文章。该报至同年6月29日终刊，共出版5期。

2月底 四中开始军训。

3月 四中师生联合组织“新四中公社”成立，是四中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此后，另一些学生成立“革命造反兵团”，与新四中公社持不同观点。

3月底 四中军训组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忆诉”。

3月27日 四中教师王行国编印油印小报，先以“阵线”名义的《新四中教工文革资料》（出版180期），发给全校教师人手一份；革委会成立后，以革委会宣传组名义，与学生的《井冈山通讯》合并为《新四中通讯》（出版62期），发至全校师生。至1968年4月底终刊，共连续出版242期。

5月17日 新四中公社出版《新四中》报，至同年9月28日终刊，共出版6期。

5月25日 四中红卫兵联合其他学校红卫兵出版《解放全人类》报，至同年8月18日终刊，共出版3期。

9月 四中革命委员会成立。伙食管理员出身的总务主任周春芳任革委会主任，管总务的副校长任副主任。军宣队在大会上讲，有了他们执政，可以保证四中不变修。秋，四中实行各派按班级大联合。

10月10日 中央发出“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四中复课。接收新生入学。

1968年

春 高中和初中学生开始陆续毕业。主要去向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和边疆，也有到工矿，或者参军的。

5月19日 毛泽东就姚文元13日送呈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转发全国，要求各地“有步骤地、

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旋即在全国展开。四中在军训团和革委会领导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前后举办了4期“学习班”，对揪出来的教师隔离审查，监督劳动，进行批斗。

5月27日 四中清队学习班动员会。第1期学习班开始。

5月30日 四中党支部副书记刘铁岭在学习班做检查，抛出他“包庇坏人”的名单。

6月5日 四中全校大会，批斗刘铁岭、黄庆发、吴济民。

6月15日 四中全校大会，批斗徐健竹、程富祺、曹会澄。

6月22日 四中全校“对敌斗争大会”，批斗王行国。

7月1日 四中全校公审大会。

7月21日 四中放暑假。

7月22日 四中清队第2期学习班开始。

10月26日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四中。

12月3日 四中清队第3期学习班开始。

12月28日 四中清队宽严大会。

1969年

2月4日 四中清队第4期学习班开始。

清理阶级队伍揪出来的人有（不完全统计）：历史教师朱鉴民、程富祺、萧立岩、徐健竹，语文教师廖锡瑞、黄庆发、刘承秀（女），数学教师周成杰，物理教师王钊、张陞，化学教师徐光，外语教师刘约华（女），音乐教师曹会澄，体育教师吴济民、韩茂富，职员王行国、陈南（女）、张育达、周继尧等。语文教师刘承秀（女）自杀，外语教师刘约华（女）自杀（未遂）。

3月27日 四中清队落实政策学习班。

4月1日 中共九大开幕。

4月16日 四中清队落实党的政策大会。

1970年

年初 王行国主持，与张佐参、洪梅芬共同建成四中电镀车间。因苯中

毒，张佐参因公殉职，王行国、洪梅芬患严重血液病，调离校办厂。

5月 四中总务处伙食管理员刘庆丰在“一打三反”中自杀。

1973年

1月 为促进学习风气，王行国四中在全校师生中组织学习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活动。王行国亲自到处采购，配齐千套廉价收音机元器件，再教授安装。这一活动在全市造成轰动性影响。

1978年

12月28日 在全校落实政策大会上，学校领导宣读了一份材料：在文革这场历史灾难中，在四中教工159人之中，有45人受到冲击和审查，18人进了劳改队，16人被抄家，25人遭殴打，4人被迫害致死（后来的一打三反中又1人被迫害致死，实为5人——作者）。很多人受到肉体摧残，人身侮辱，精神打击。

【来信】

1、赵建国、孙大军谈唐伟文

《记忆》编辑部：

唐伟的文章太长了，不符合贵刊的要求。如果可以分成两期发可能会好一点，它本来也是谈两个问题嘛。但是，如果耐下心慢慢读（在看奥运的百忙之中，我用了两天的晚上看完了它），还是会有收获的。而且，越读到后面，收获越大。我们都关心教育，他谈到了根上，尤其是对蒋南翔教育思想的分析。

赵建国

2012-8-7

《记忆》编辑部：

唐伟对“灾难铸就辉煌”的批评。好，赞！

孙大军

2012-8-15

2、顾军骧谈本刊的“三个面向”

《记忆》编辑部：

欣闻贵刊以“三个面向”为宗旨，这对于青年学子是件大好事。当今之学界，讲人脉，讲山头，讲后台靠山。而大部分青年学人是无人脉、无地盘、无靠山后台的“三无”人员。虽然你们没有稿费，没有纸版，但是在学界和读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的老师不但上课时提到《记忆》，而且我还听到好几个媒体的老总、编辑提到你们。说你们的文章质量高。这让我觉得在《记忆》上发稿是一种荣誉。听说你们每年都要出版精选本，这对于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因为我所在的大学，并不在乎你在什么地方发表文章，只要你拿来正式出版的书，这书里有你的文章，你在评职称发表文章的目录上，就可以增加一笔。

知道吗？你们在为青年学者评职称贡献了力量呢！

顾军骧

2012-8-21

3、胡庄子转来“雄师”的来信

《记忆》编辑部：

我的《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一文在《记忆》总第39期发表后，“雄师”的主要负责人周平曾致信于我，补充了“雄师”的有关情况（见《记忆》总第41期）。近日，“雄师”的另一个负责人冯正永给我发了电子邮件，对有关“雄师”的几个问题做了明确的答复。征得冯本人同意，转给贵刊，或许对关心和研究“雄师”的人有些价值。冯对诸问题的答复如下：

1. “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文革的吗？

大字报没有反对中央文革，但是对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表示反对。实际我们当时认为，中央文革是背离毛路线的。

2. “雄师”成立于何时？

正式成立在1966. 12. 30, 宣读并通过了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雄师”的名称也是那晚决定的。但是在成立雄师之前，有过大约半个月的准备，也就是讨论起草《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参加讨论起草该文的有冯正永、许大正、周平、赵蔓军四人。当时的教师朱军没有参加讨论，但是他介绍了周平和赵蔓军来与我交换观点，而交换观点的结果就是决定成立组织，写大字报。讨论后，我负责起草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直接拿到1966. 12. 30会上，一致同意，没有修改，就发表了。

3. “雄师”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

“雄师”的成员有约30人。主要者为冯正永、周平、许大正等。“雄师”成员主体是由643（周平、万庆友、杨恒祥等）和644（冯正永、许大正、姜作勤等）两部分人组成，其他各系和年级人数都比较分散。陆仁安、葛胜宝都不是“雄师”的成员。陆仁安我当时就知道，他的观点与“雄师”接近。最后被拘留的有：朱栋培（即朱军，因为他是组织中唯一的教师，但是他没有参加“雄师”的正式活动。他自己成立了“孙悟空”战斗队，一个人的战斗队。他的文章主要是小品类。文革中常常要把“反革命”组织说成是受人操纵的，所以就找一个教师。）冯正

永、周平（“雄师”主要两篇文章的作者，“雄师”的组织者）。江晓东、黄晓光（“雄师”一般成员。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他们在文革前曾有过与当时环境不合的言论。为将一个组织打成反革命，就把他们俩说成“雄师”骨干。他们为雄师坐牢，实在是冤枉。）

胡庄子

2012-08-23

4、杜钧福指出向前论文的注释有问题

《记忆》编辑部：

本期向前的学位论文《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三）》和以前两部分一样，论述很严谨，但是此期中31-32页有一段话：“工作组传达‘中央八条’的指示后，学生中爆发出强烈的反对情绪，说‘八条’是框框，是压制革命的大字报很快出现在校园里。反对工作组的行为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員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反对工作组的意思，这种表态为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提供了信心和力量，他们认为反对工作组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注1）因为工作组压制了群众运动。”

其中（注1）是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查该书并无中央文革鼓励反工作组的内容，只有《人民日报》社论鼓励造反的内容，也未具体鼓励反工作组。我们所见的中央文革反工作组的行为是6月20日陈伯达提出撤出工作组的建议，但当时不为群众所知。如果在这之前中央文革成员有鼓励反对工作组的言论，作者应该提出证据。

此致敬礼！

杜钧福

2012-9-3

5、张晓良谈王锐书及文革藏品

《记忆》编辑部：

1、王锐先生的《文革小报兴亡史》，无法在国内正式出版，遗憾！联想到许多涉及文革、党史题材的著作只能在香港、甚至美国出版；即便有的能在内地出版，但与港版相比又成了删节版；而这些在香港、美国出版的书进海关时又被查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王锐全书洋洋二十六章，不知何时能窥全豹。

2、“文革纸品收藏” <http://blog.sina.com.cn/wgcd> 这个博客有大量文革资料。读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卷附录五，陈国康收集大量文革小报传单等，已归复旦。

3、《记忆》87期第47页有“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网上有宣传画。



4、《记忆》第87期第68页“口述访谈陷阱问题”，值得注意。我曾写博文“水生所排演京剧《沙家浜》之回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0b305e01012a2x.html

张晓良

9月10日

